

社會主義

恩格斯著
曹真譯



文源出版社發行



恩格斯著
曹真譯

社
會
主
義

文
源
出
版
社

社會主義

作者 恩 格 斯

譯者 曹 真

出版者 文 源 出 版 社

發行人 葉 波 澄

發行所 文 源 出 版 社

一九四九年十月初版

上海復興中路一二五七B號
電話七八四三二

版權所有

509.2
104
(141)2



序

馬克思在他的經濟學批評的序言中，敘述我們兩人在一八四五年於布律塞爾決定同著一部著作，解剖我們的觀點——馬克思所研究出來的唯物史觀——與德國哲學思想上的觀點之衝突點，并表示對於我們從前的哲學意見之態度。我們以批評黑格兒以後的哲學之方式來實行我們的計劃。當我們的原稿——兩大本八開本的書——交給魏斯發里（Weisphalie）某書局很久以後，人們才告訴我們說：因為環境改變，這部書不能出版了。我們的目的已經達到以後，即我們自己已經明瞭了，我們也情願讓這部原稿給耗子們去囓食批評。

自此以後，過去了四十多年，我們沒有機會再討論這個題目，而馬克思已經死了。我們偶然也在幾處說到我們對於黑格兒的態度，但我們從來未曾連貫的和概括的說過。關於費兒巴赫，我們更沒有說到，然而他在許多方面乃是黑格兒哲學和我們的觀點間一個中間環。

在這期間，馬克思的宇宙觀，甚至在德國和歐洲以外以及世界上一切開化的民族中，都找到了信徒。他方面，我們也看見德國古典哲學在外國尤其在英國和斯堪的那維（Scandinavia）半島，有一種復興現象；即便在德國，那以哲學名義分發的折衷學說的淡薄羹湯，似乎人們也開始厭飽了。

在這條件之下，我以為簡略的敘述：我們與黑格兒哲學的關係，我們怎樣由黑格兒出發，我們怎樣離開黑格兒哲學——是一天比一天更加需要的。我完全承認，當我們正在進取和狂鬥時期，費兒巴赫對於我們，比黑格兒以後其他一切哲學家，有更大的影響，——我認為這樣的承認是我們應該償還而未償還的名譽債。所以當新時代雜誌（NeueZeit）編輯部要求我批評士達克（Stark）關於費兒巴赫的著作時，我就懇切的利用這個機會。我的著作發表於這個雜誌一八八六年第四期和第五期，現在又印成單行本形式出版。

拿這部稿子去付印以前，我又拿出一八四五年至一八四六年的原稿（指德國思想，即前述共著書）來重讀一遍。關於費兒巴赫一章尚未寫完。已完的部分是敘述唯物史觀，這一部分祇表示我們當時關於經濟史的知識是何等的不完全。對於費兒巴赫學說的

批評還沒有寫好；這對於我的直接目的，是沒有用處的。但我却在馬克思的一本舊抄本中找到馬克思所寫的費兒巴赫論綱要，現在拿來發表作為本書的附錄，這是隨筆寫成的綱要，準備以後繼續研究的，絕不是準備付印的，但這是非常可寶貴的原始文件，其中含有新宇宙觀的天才的萌芽。

恩格斯於倫敦 · 一八八八年二月二十一日

導論 (註一)

這一本小書是從一本更大的書中摘錄出來的。在一八七五年前後，柏林大學的講師杜林博士 (Dr. E. Dühring)，突如其來的甚至大吹大擂的宣布他的皈依社會主義，並帶來一種完全的社會主義理論——其中有實際改造社會的整個計劃——貢獻於德國人民面前；他以為應該盡全力的向着他的前輩尤其是馬克思猛攻。

這件事發生，差不多正在德國社會黨中兩派——馬克思派和拉沙爾 (Ferdinand Lassalle) 派——合併的時候，那時這兩派合併不僅增加力量，而且更重要的，還得着運用這一力量以為反對共同敵人的手段。社會黨那時正在迅速的變成德國的一種權力。但要變成一種權力，必須這個新造成的黨內統一不被危害；可是，杜林博士已經公開的開始在他個人周圍團結了一派私派，以備未來分裂出另一黨之核心。因此，我們必須拾起

(註一) 這篇導論是恩格斯當一八九二年這一本小書的英文譯本在倫敦和紐約同時出版時所寫的。(拉
發格註)



別人丟給我們的手套（註一），不管自願的或被迫的，我們總要與之鬥爭。

事情並不是非常之困難的，但却經過長久的時間。我們德國人 人人都知道，是非常之可厭的 *Gründlichkeit*（深沉）的，深沉的澈底或澈底的深沉，隨便那樣說都可以。每次當我們之中的一個發明出他認為是一種新理論時，他必須一開始就將這個理論造成爲包括全宇宙的一個體系。他必須證明邏輯的最初原則和自然界的根本規律，其永久的存在，祇爲要領導人類精神到這個新發現的完成一切的理論去；在這關係上，杜林博士是達到民族天才之最高點的。他的心理的倫理的自然界的和歷史的完全的哲學的體系，他的完全的經濟學和社會主義的體系以及他的經濟學的歷史的批評——這三部八開本的大書，其形式及其內容一樣的笨重，這三路理論的大軍，調動來攻擊以前一切的哲學家 and 經濟學家，特別攻擊馬克思——其實不外是完全的『變革科學』的一種企圖；所以我必須答覆他。我一切都說到，並還說到其他的許多題目；從時間和空間的概念說到雙本位的貨幣制度；從物質與動的永久性說到我們的倫理觀念的易滅性；從達爾文的天擇論說到未來社會青年的教育。然而，我的敵人學說體系上的繁複却給我以機會，發揮

（註一）歐洲古代習俗，丟下手套是挑戰的表示，拾起手套是接受挑戰的表示。（譯者註）

與他相反的見解，這也是馬克思和我關於這許多繁複問題的見解第一次貫串起來成爲系統的。這就是我担負這種使命的重要原因——這種使命究竟是煩難的。

我的答覆最初登載於社會黨的主要機關報，萊普齊的前進報，隨後彙集成一本書，標題爲杜林式的科學的變革。此書第二版在一八八六年出版於朱里赫(Zurich)。

經我的朋友拉發格之請求，我修改這本書中三篇而成這本小書，給他譯成法文，於一八八〇年出版，標題爲空想社會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隨後由法文譯成波蘭文和西班牙文出版；但在一八八三年，我們的德國朋友又以德文原文出版這本小冊子，自此以後，從德文原文翻譯出版的，有意大利俄羅斯丹麥荷蘭和羅馬尼亞各種文字的譯本，連上這個英文譯本，這本小書已經譯成十種文字了。我未曾看見其他的社會主義著作，連一八四八年出版的我們的共產黨宣言和馬克思的資本論在內，能像這一本小書經過那樣多種文字的翻譯；在德國這一本小書已重印四次，共銷二萬本。

我完全知道，這一本小書將不爲英國一大部分的讀者所歡迎。但我們大陸上的人如果稍爲留心到英國的『尊嚴』的成見，那我們的地位將比現在所處的更壞。這一本小書

辯護我們所稱爲「歷史的唯物論」，而唯物論一個名詞是刺激廣大多數英國讀者的耳朵的。「不可知論」尙可望饒恕，至於「唯物論」則是絕對不能容許的。

然而，近代唯物論的搖籃，乃是十七世紀的英國。

「唯物論」乃是英國的私生子，英國的大經院派學者登司考脫(Duns Scot)已經自問：物質能否思想。

要實現這個聖跡，他就求援於上帝的萬能，因此，強迫神學來宣傳唯物論。究竟，他是一個唯名論者。唯名論——這一唯物論的最初形式——主要的是在英國的經院派學者中發展。

英國唯物論以及整個的實驗科學之生父，乃是培根(Bacon)。他認爲自然科學是唯一真實的科學；建立在感官經驗的物理學，是自然科學的基礎部分。安那薩哥拉斯(Anaxagoras)及其 homoimerie(種子)和德謨克里特(Democrite)及其 atom(原子)，是他所敬重的威權。在他的學說中，感官是完全可靠的；感官是一切知識的源泉。科學就是實驗的知識，科學的作用就在以理性的方法去整理感官所供給的材料。歸納，分析，比較，觀察和實驗，就是理性的方法之主要形式。物

質固有的最初的和主要的本質，就是動——不僅是機械上的和數學上的動，而且特別是衝動 (Impulsion) 生活力 (Principe vitale) 興奮 (Tension) 和——借用鴉哥波姆 (Jacob Boehme) 的術語——痛苦 (Torture)。

在培根——唯物論的第一個創始者——的學說中，唯物論而且質樸的包孕着各方面發展的萌芽。物質以其感覺的和詩意的華美對人微笑。但培根的格言式學說却仍充滿了神學上的矛盾。

唯物論在其發展的進程中，變成爲畸形的。霍布士 (Hobbes) 將培根的唯物論理成系統。在霍布士學說中，感覺失去了牠的華美性，而成爲幾何學上的抽象的感覺。物理的動變成了機械的或數學的動：幾何學居一切科學之首。唯物論變成了像一個厭世的人；如果他要自己的領域內戰勝厭世的和瘦弱的唯心論，他就應該剋制自己的肉體并變成禁慾修道士。唯物論是理性的產物，因此牠不遲疑的發展理性的效果。

霍布士從培根出發，證明說：如果人類的一切知識是由感官供給的，那麼概念，觀念，不過是物質世界多少脫去其感覺形式的幻影而已。科學祇能替這些幻影

定立名字。我們能夠應用同一名字於許多的幻影。名字也可以有名字。但這將是一種矛盾：一方面肯定說一切觀念導源於感官世界；他方面又以爲一個字不止有一個字的意義，以爲除了感官所感覺的和永久個別的具體的物體之外，還存在有總的和抽象的物體。說有一種非形體的質體，是不合理的，就像說有一種非形體的形體一樣。形體、物體、質體，祇是應用於同一的實在的三種不同的名詞，我們不能將思想從能思索的物質分別出來。這個物質就是一切變化的本體。『無限』這個名詞是空洞無意義的，因爲這并不是表示我們精神的機能能夠計算事物至於無限。既然我們的感官祇能感覺到物質，自然我們就不知道上帝的存在。祇有我自己的存在是確定的。一切人的情慾乃是機械的動之開始或終止。衝動的對象是善。人與自然界服從同樣的規律。力和自由是同一的。

霍布士整理了培根，但他并未拿證據來證明他的根本原則，即認爲知識和觀念的起原是在感官世界的原則。洛克（Locke）在他的人類悟性起源論才證明這一原則。

如果霍布士消滅了培根的唯物論之自然神論（Deism）的成見，那麼高林士

(Collins) 獨華爾 (Dodwall) 高華德 (Coward) 哈德烈 (Hartley) 卜黎斯德利 (Priestley) 等就剷除洛克的感覺論之最後的神學障礙。無論如何，對於實際的唯物論者，有神論不過是撇開宗教的一種便利方式而已。』(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聖聖家族 (Die Heilige Familie)，一八四五年佛蘭克福 (Frankfort) 出版，第二〇一至二〇四頁)

馬克思關於近代唯物論之英國的來源就是這樣寫的。如果現在英國人對於這樣的公平判斷他們的祖先而特別的不喜歡，那我們只有代他們惋惜。培根霍布士和洛克是光榮的法國唯物論學派之生父，這是無可否認的；雖然法國十八世紀在陸上和海上都敗於英國人和德國人之手，法國的唯物論者，却能使十八世紀成爲毫無疑義的法蘭西世紀，即在法蘭西大革命前也就如此；而我們外國人，我們在德國和英國正要收穫法蘭西大革命所結的果實哩！

這是無可否認的；受過教育的外國人，當十九世紀中葉，到英國居住時，時常討厭看見『尊嚴的』英國中等階級之宗教上的愚蠢和迷信。在那個時候，我們都是唯物論者或至少都是很急進的自由思想者，我們想不到英國所有受教育的人差不多都能夠信仰一

切種種不可能的聖跡，甚至地質學家如卜克蘭(Buckland)和孟德爾(Martell)也都攆毀其科學的學理使之不與創世記的精神相衝突；至於要找那些敢於自由使用理智的機能於宗教材料的人，就應該到不文的人當中，到一般人所稱爲「The great unwashed」(大齷齪人)(註一)當中，特別在歐文派社會主義者當中，去尋。

但自此以後，英國就開化了。一八五一年的一展覽會，就是英國島國閉關性的喪鐘！英國在食物，習慣和觀念方面，已經國際化了到一種程度，使我開始禱祝英國的某種習慣和風俗也傳到大陸去，像大陸的其他習慣傳到英國來一樣。青菜加油的食法，英國在一八五一年前祇有貴族知道，現在這種食法已經傳播全英國了，大陸對於宗教的懷疑論也跟着這種食法不可避免的傳播到全英國。不可知論至今雖尚未如像英國國家教會那樣

(註一) The Great Unwashed 按照字面譯起來，就是「不洗身的大人」。列德魯羅林 Ledru

Rollin) 瑪志尼 (Mazzini) 畢葉 (Piat) 以及一八四八年玫瑰色的共和黨人，也是輕蔑社會

黨人；他們說 Democratic (民主社會黨人的縮寫) 是與肥皂作戰。清潔是價值高貴的奢侈品，受資產階級榨取的工人階級是難於得到清潔的。這些聰明的先生們將他們的資產階級同伴

給與工人的貧困，當作工人的一種罪惡。(拉發格註)

受人敬重，却已提高到與浸禮教(Baptism)同等尊崇的位置，并無可否認的超出於救世軍之上。我不能阻止我夢想，這種情形，對於那些感傷於非宗教思想之進步的人，將是一種安慰：他們知道這些『近日的思想』不是外國販來的和德國製造的，像許多日用品一樣，而是不可否認的地道的英國貨；二百年前製造這些貨品的英國人，更長遠的走過了他們今日的子孫所不敢走的道路。

事實上，不可知論如果不是遮遮掩掩的唯物論，究竟是甚麼呢？不可知論的自然界觀，完全是唯物論的。自然界是受一定的規律支配着，並不允許外來行動來干涉；但不可知論又申明說：『我們沒有方法可以肯定或否定已知的世界之外有某個至高主宰之存在。』這個在勞伯宿(Laplace)驕傲的回答拿破侖的詢問時代，也許還有理由，——拿破侖問勞伯宿：他的天體力學一書中何以連『造物者』的名字都不提起？勞伯宿回答說：『我無需要這個假設。』但現在，我們有了宇宙進化的概念，就絕對沒有一個位置給造物者或命令者；說有一個至高主宰，被屏於現存宇宙的門外，這在字句上是一種矛盾，而且據我看來，也是對於信教人的感情的一種無來由的侮辱。

我們的不可知論者也承認，我們的知識是建築在感官所供給的材料上面的；但他們

忙着聲明說：『怎麼知道我們的感官供給我們以其所感覺的事物之質象，是正確無訛呢？』他們又繼續告訴我們說：他們所說的事物及其性質，實在并非這些事物和這些性質，——這些他們是一點都不知道確實的——他們所說的，祇是這些事物在他們的覺官所發生的印象。我們似乎難於拿論證的方法，來攻擊這種推理方式。但在論證以前，先有行動 *Im Anfang war die that*。（註一）人類的行動已經解決了這個難題好久以後，而人類的才智才發現這個難題。當我們根據我們所感覺的事物性質而使用這個事物之時，我們就是以確切的考驗，證明我們的感官所感覺究竟真實與否。如果這些感覺是錯誤的，那麼我們根據這些感覺而去使用這些事物，必然是錯誤的，因此我們的嘗試要遭失敗。如果我們成功達到我們的目的了，如果我們證明出事物適合於我們對這些事物的觀念了，這就是積極的證據，證明我們對於事物及其性質的感覺，在一定限度之內，恰好適合在我們之外的真實。當我們失敗時，在一般情形之下，我們不久就可發現我們所以失敗的原因；我們發現那為我們的嘗試基礎的感覺，或者本身是不完全的或皮面而不深入的，或者牽連到其他的感覺材料而這些材料還是未經證實的——這樣就是我們所

（註一）『行動在先』——哥德的浮士德中的話。（拉發格註）

稱爲不健全的推論。如果我們時常注意正確的訓練和使用我們的感官，幷限制我們的行動於我們正確取得的和正確使用的感覺所劃定的範圍之內，那我們就時常發現我們的行動的結果證明我們的感覺能適合於所感覺的事物的客觀性。直至現在，幷未曾有一個例證，允許我們做出結論說：我們的經過科學監督的感官之感覺，在我們的精神上發生出一些對於外界的觀念，其性質是與真實矛盾的，或者外界和我們的感官之感覺中間，有極大的衝突。

現在，新康德派的不可知論者來了，他們說：『我們能夠正確感覺一件事物的性質，但無論用何種感官的或精神的方法，我們都不能夠認識「自在之物」，「自在之物」是在我們的認識界限之外的。』黑格兒很久以前就已經答覆了他們：『如果你們認識了一件事物的一切性質，你們就認識了「自在之物」；再沒有甚麼了，除非是一件事實，卽事物是存在於你們以外的，當你們的感官報告你們以這件事實時，你們就完全全認識得「自在之物」卽有名的康德的不可知的 Ding an Sich（自在之物）了。』我們公平的說明一點：卽是在康德時代，我們對於自然物的知識還是片斷而不完備的，因此有權可以假設，在我們對於每個自然物的微少的認識之外，有個神祕的「自在之物」

存在。但這些抓不住的事物已經一件件的被科學的長足進步所抓住了，所分析了，而且還『仿造』過了；我們自己能夠製造的東西，我們就不能看做是不可知的。有機物，在十九世紀前半期的化學家看來，就是這一類神祕的事物；現在，我們不依賴任何有機的手續，就曉得依照其化學原素一個個的製造出來。近代化學家宣言說：祇要知道任何質體的化學構成，就可以依照其原素製造這個質體。我們現在尙遠不知道最高有機質體即蛋白質之構成；但沒有理由可以使我們失望，說我們不能夠知道這種構成，說我們縱然經過幾世紀的研究（如果需要），也不能夠製造人造的蛋白質。當我們達到這一地步時，我們將可以製造有機的生命，因為生命自最簡的形式直至最高的形式，不過是蛋白質之成爲有規則的狀態而已。

然而，我們的不可知論者，自從發出這種純粹形式的心理上的聲明之後，就像十全十足的唯物論者一樣說話一樣行動，——他們本來就是唯物論者。他們說：『就我們所知道的來說，物質和動或——如現在所說的——能力，是不能夠創造也不能夠毀滅的，但我們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這些東西不是於某個時候創造起來。』可是，如果你在某種特殊情形之下拿這樣的推論反來攻擊他們，那他們就要忙着停止辯論。他們在抽象

上可以承認唯神論，但在具體上一定不肯承認。他們將對你說：『在我們認識并能夠認識的限度之內；宇宙間是沒有造物者和命令者存在的；我們所要知道的，即物質和能力是不能創造也不能毀滅的；對於我們，思想乃是能力的一種形式，乃是腦筋的一種作用；我們所知道的，就是物質世界是受一些固定不變的規律所支配着。：：：』總而言之，當他們是一個科學家的限度內，當他們知道一些事情的限度內，他們是唯物論者；但在他們的科學以外，在他們所不知道的範圍中，他們就將他們的『不知』譯成希臘文，而稱爲『不可知論』。

無論如何，有一件事情對於我是明顯的：即使我也是一個不可知論者，顯然我也不能將這一本小書所說的歷史觀稱之爲『歷史的不可知論』。因爲不然，宗教徒將嘲笑我，不可知論者將憤怒起來，並要質問我是否我在嘲笑他們。因此，我希望『尊嚴的』英國人不要太過於憤怒，——如果我在英文中亦如在其他許多文字中一樣拿『歷史的唯物論』一個名詞來表示一種歷史觀，——這種歷史觀，是要在社會的經濟發展中，在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易中，在社會的階級分化中。在這些階級的鬥爭中，去尋求一切重要的歷史事變之最初原因和推動力量的。

如果我表示歷史的唯物論對於『尊嚴的』英國人也有相當利益，則人們將更容易允許我使用這個名詞；我在上面已經說過，四五十年前，住居在英國的受過教育的外國人，討厭看見『尊嚴的』英國中等階級之宗教迷信和愚蠢。我現在要說明，那個時代英國的『尊嚴的』中等階級，並不像外國智識分子所想像的那樣愚蠢。他們的宗教成見是可以解釋的。

當歐洲脫離中古時代時，城市的日漸長大的資產階級在歐洲中形成革命的原素。資產階級在封建的組織之中已經取得一種地位，這種地位，對於牠的發展力量，已經變成太過狹小了。中等階級即資產階級的發展，與封建制度的保持，成爲不能并立的形勢：封建制度必須毀滅。

但封建制度的國際總中心乃是羅馬天主教的教會。西方歐洲雖然有內部戰爭，但整個的被羅馬天主教會統一起來成一大政治系統，對抗別教派的希臘，同時也對抗回教國家。這個教會在封建制度之上加了一個神賜的光圈。這個教會仿效封建制度的等級制造成自己的教會的等級制，並終於自己變成了最強大的封建諸侯，至少佔有天主教國家三分之一土地的大地主。要分別在各國零碎的打擊封建制度，就應該先毀滅這個中心

組織。

科學的大覺醒，與資產階級的長大，成爲平行的現象；天文學，機械學，物理學，解剖學和生理學，重新被人拿來研究。資產階級，爲發展工業生產起見，需要科學，以研究自然物的物理性質和自然力的運動方式。在那時以前，科學是教會的恭順的婢女。教會從來不允許科學跨出信仰所限定的界線之外，因此那時的科學是一點也不科學的。科學於是暴動起來反對教會，資產階級如果沒有科學，是一點也沒有辦法的，因此牠必然參加這個反抗運動。

以上，我祇說到日益長大的資產階級必然要與當時佔統治地位的教會發生衝突諸點中之二點，但已經足夠證明：第一，在反對天主教會特權鬭爭中最有直接利益的，是資產階級；第二，一切反對封建制度的鬭爭，當時都帶着宗教的面具，而且首先必然要打擊教會。但當時如果大學師生和城市商人發出戰爭呼聲，那在鄉村民衆中在農民中必定能夠得着并確實得着了迴聲，——當時農民到處舉行艱苦的鬭爭，以求得他們的生存而反對教會的和俗世的封建諸侯。

資產階級反對封建制度的長期鬭爭中，有三次偉大的和決生死的戰爭。

第一次戰爭是德國的宗教改革。隨着路德 (Luther) 反對教會的戰爭呼聲而起的，有二次政治暴動：西肯根 (Franz von Sickingen) 領導的小貴族的暴動 (一五二三年) 和農民大戰爭 (一五二五年)。這二次戰爭都失敗了，特別是因爲最有切身利益的城市資產階級之猶豫；——這裏，我們不能尋求資產階級所以猶豫的原因。從那時起，鬪爭就變質成了各地諸王和中央皇帝政權間不停的戰爭，結果使德國在兩個世紀中失去了在歐洲民族中起政治作用的資格。可是路德的改革却產生一種新的信仰，一種適合於君主專制的宗教。德國東北部的農民，祇因改信了路德教，遂由自由人變成了農奴。

但路德失敗了，加爾文 (Calvin) 却得勝利。加爾文的宗教改革正適應當時最前進的資產階級的要求。他的命定論 (Predestination) 的學說就是在宗教上反映一件事實：即在競爭的商業世界中，成功失敗並不關於個人的活動和技巧，而是關於不受個人支配的環境。成功或失敗并非受個人的意志和行動所決定的，而是受至高的和無形的經濟權力所決定的；這在經濟革命的一個時代，特別是真確的，那時一切舊的商業中心和一切舊的道路都爲新的中心和新的道路所代替了，那時印度和美洲市場發現了，那時古代最貴重的經濟的聖物——金和銀的價值——也開始動搖并趨於衰落了。加爾文的教會制度

是完全民主的和共和的；上帝的王國既然共和國化了，世上的王國自然不能仍在君主主義和諸侯統治之下。正當德國的路德教情願變成德國諸王手裏合用的工具之時，加爾文教却創立一共和國於荷蘭及一些活動有力的共和黨於英國尤其於蘇格蘭。

資產階級的第二次大暴動，就將加爾文教看成爲完善的戰鬪理論，適合資產階級需要的學說。這次暴動爆發於英國。城市中等級首先加入運動，鄉村的 Yeoman（註一）則使運動勝利。奇怪的，即在資產階級三次革命中，農民供給軍隊，贊助戰爭，取得勝利，而農民是必要受勝利的經濟影響而破產的。克林威爾（Cromwell）之後一個世紀 Yeoman 就消滅了。可是沒有這些 Yeoman 沒有城市平民分子，資產階級祇靠自己力量，是永不會繼續鬪爭至於勝利并將查理第一推上斷頭臺的。爲使資產階級這些已經成熟的和可以收穫的勝利果實，能有保證，革命必須遠超過其原來的目的——一七九三年在法國和一八四八年在德國恰好也都是這樣。似乎這就是資產階級社會進化規律之一。

革命行動的這種過火之後，在英國接着就是不可避免的反動，這個反動也超過了牠

（註一）Yeoman 是耕種自己土地的自由的小地主；這種人在當時的英國是爲數很多的。（拉發格註）

能夠支持的界線。經過了多次搖擺之後，新的重心終於達到了，并變成了新的出發點。英國歷史上的偉大時代，『尊嚴的』英國人竟稱之爲『大叛亂』，而隨後的鬭爭祇結局於一六八九年比較微小的事變，但自由派歷史家反稱之爲『光榮的革命』。

新的出發點乃是日益長大的中等階級和以前的封建地主中間的妥協。這些封建地主，雖然當時甚至現在仍被稱爲貴族，其實是正在轉變成爲後來魯易非立 (Louis-philippe) 所變成的『王國的第一個資產者』。在英國，僥倖舊的封建諸侯已經在『二玫瑰戰爭』中自相殘殺殆盡了。他們的後裔，雖然一般的是從舊世家出身，但并不走其祖先所開闢的道路而另成一新的階級，這個階級的習慣和傾向，與其說是封建的，寧可說是資產階級的。他們完全認識金錢的價值，他們驅逐幾百家佃戶，代之以綿羊，以此開始直接的增加他們的地貨。亨利第八 (Henry VIII) 分散教會的土地爲贈品及浪費之用，因此造成了一大羣的新的資產階級諸侯；他死後十七世紀末仍繼續着的沒收無數大土地轉賣給半暴發戶或全暴發戶的事，也達到同樣的結果。所以，自從亨利第八以來，英國的『貴族』不僅不反對工業生產的發展，反要設法從中間接的取得利益；而且還有多數的大地主，他們，因爲經濟的和政治的原因，時刻準備着來與工業財政資產階級首領合

作。一六八九年的妥協，所以很容易就完成了，政治的利益——財富和位置——仍留在大貴族世家手裏，祇要工業和財政資產階級的和經濟利益不被人忽視。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當時要統治全國的政治，是饒有餘力的，結果仍然是資產階級支配全國總的政治。關於零碎問題的爭端固然也有，但貴族的巨頭政治明顯知道，他們的經濟繁榮必不可免的要連繫於工業和財政資產階級的經濟繁榮。

從那時起，資產階級變成了英國統治階級中的一組成部分，恭順的然而正式被承認的一部分，與其他部分有共同利益來壓服全國的廣大工人羣衆。商人或手工工廠主人，對於其工人夥計和僕人，就站在主人的地位；或者像以後的英國人所說的，站在『天然上司』的地位。他們的利益命令他們從工人中壓榨出儘可能的好的勞動；爲此原故，他們必須訓練工人使之有良好的服從習慣。他們是宗教徒，宗教會經成爲他們攻擊國王和諸侯的旗幟；他們不久又發現宗教也可以利用來麻醉他們的『天然下屬』的靈魂，使之服從主人的命令，使之相信主人是上帝位置在工人頭上的。簡單說，英國資產階級也參加壓迫『下等階級』——全國廣大的生產羣衆；壓迫的工具之一，就是宗教。

另外一件事實也助成資產階級的宗教傾向愈加強盛；這件事實就是英國唯物論的發

生。這個新學說不僅侵犯了中等階級的敬神的感情，而且自己就宣布是一種祇適用於受教育有知識的上流人的哲學，而與無知識的階級所信仰的宗教對抗，——當時資產階級也是算在無知識的階級內的。霍布士帶着唯物論，出來成爲君主專制和國王特權的辯護士，唯物論擁護君主專制去壓迫平民——這個 (*Puer robustus sed malitiosus* (註1))。霍布士的繼承者布林勃羅克 (*Bolingbroke*) 沙推斯布利 (*Shaftesbury*) 等也是一樣；自然神論的或唯物論的這個新形式，像過去一樣，仍舊是貴族祕傳的學說，因此由其宗教的異端性及其反資產階級的政治影響，遂爲資產階級所仇視，所以，爲對抗這種貴族的唯物論和自然神論，新教派就繼續成爲進步的資產階級之主要力量；此教派過去曾經供給反對斯多亞德 (*Las Stuars*) 王朝戰爭以旗幟和戰士，如今仍然成爲『大自由黨』的骨幹。

在這時候，唯物論就由英國傳到法國去，在那裏遇見了另一派唯物論——笛卡兒學說的一支派，而與之混合。最初唯物論在法國仍然是專屬於貴族的一種學說，但其革命性不久就顯露出來了。法國的唯物論者不限制他們的批評於宗教問題範圍內，他們攻

(註1)『強壯的但是兇惡的小孩』。(譯者註)

擊一切在他們道路上的科學傳統和政治制度；他們爲要證明他們的學說可以普遍應用起見，他們就勇敢的在一部巨大著作中，即他們稱爲百科全書(Encyclopédie)中，應用唯物論於科學的一切問題。這樣，這個學說，在其任何一形式——公開的唯物論形式或自然神論形式——之下，都成爲法國一切受教育的青年之信仰，到了大革命爆發時，由英國王黨懸爭出來的哲學學說，倒給共和黨和恐怖黨拿去作理論的旗幟，并爲『人權宣言』的基礎。

法國大革命就是資產階級的第三次暴動；但這是第一次完全丟開宗教面具，而澈底的站在政治上作戰；這也是第一次推展鬪爭到底，直至交戰的一方——貴族——消滅而另一方——資產階級——完全勝利而後已。在英國革命前制度和革命後制度並存以及地主和資產家妥協，這種情形反映出來的，就是以前的法律仍舊存在，就是法律的封建形式仍是很受尊重的保存着。法國革命則完全與過去的傳統斷絕關係，掃蕩封建制度最後的遺跡並頒佈民法(Code civil)——這是巧妙的採用舊羅馬法，使之適合於近代資本主義條件的。法國民法差不多完全反映馬克思所稱爲『商品生產』的發展階段之經濟關係。革命的法國民法，現在還成爲一切國家（連英國在內）用以改善其關於財產的法律

時所根據的範本。我們不要忘記，如果英國的法律以這種封建的野蠻語言，繼續表示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關係——這種野蠻語言對於所表示的事物，就像英文的寫法對於讀音一樣（法國人說：『你寫的是倫敦，但你讀的是君士坦丁堡』）——那麼，這裏英國法律也是唯一的法律，經過幾世紀還能保存着，並將其傳自日耳曼民族關於個人自由關於地方自治關於法庭外不受任何干涉的獨立精神之最好的部分，流傳到美洲及其他殖民地，這些部分——歐洲大陸在君主專制時代已經喪失了，而且并未在任何地方完全恢復起來。

我們回頭再來說英國資產階級。法國革命給英國資產階級以良好機會，靠着大陸上君主專制國的幫助，得以撲滅法國的海上商業，吞併法國的殖民地並打破法國對於海上競爭的最後的圖謀。這就是英國資產階級對法國革命作戰的原因之一。

另一個原因，就是英國不喜歡法國的行爲態度，不僅因爲法國的『可厭的』恐怖主義，而且因爲法國企圖推行資產階級法律至於極端。英國資產階級沒有牠的貴族，能行嗎？英國貴族教給資產階級以美麗態度，改正牠以前的醜陋態度，替牠發明時髦的服裝，供給牠以陸軍軍官去維持國內治安，以海軍軍官去佔領殖民地 and 國外市場。不錯，

資產階級中有一小部分進步分子，這種妥協對於他們並沒有多大的利益；這一部分人主要的是屬於較不富足的中等階級，他們同情於革命，但他們在議會中是沒有力量的。

這樣，唯物論愈加成爲法國革命的信心，敬神的英國資產階級就愈加加緊的抓住宗教。巴黎的恐怖統治豈不明顯表示，如果羣衆失去宗教的感情，世界將鬧成甚麼樣子嗎？唯物論愈加從法國傳播到其他國家去，結合類似的各派學說尤其德國哲學而堅強起來；唯物論和自由思想愈加變成大陸一切受教育的人的必需的標幟，英國中等階級就愈加沉溺於無數的宗教派別裏面。這些教派中間，雖然各不相同，但無條件的都帶着基督教的宗教色彩。

正當革命在法國保證資產階級勝利時候，瓦特(Watt)互爾克來特(Arkwright)卡爾特來特(Cartwright)及其他諸人，就在英國開始產業的革命，使經濟權力的重心完全轉移。資產階級的財富巨大的增加，比貴族的財富增加得更快。在資產階級內部，財政貴族，銀行家等，也被工廠製造家推落於次等的位置。一六八九年的妥協以及以後根據資產階級利益而部分的修正此妥協條件，已經不能適合於雙方的關係了。這些階級的性質也已經大大的改變；一八三〇年的資產階級，與前世紀的資產階級，有巨大的差

別。政治權力本來在貴族手中，貴族使用這種權力來抵抗工業資產階級之新的要求，這種情形已經與新的經濟利益不能共存了。反對貴族的新鬪爭，已經成爲必要的，這種鬪爭的結果祇有新的經濟權力能夠勝利。首先，由於一八三〇年法國革命的推動，『修正選舉法』就不顧一切反對而通過了。這個法律使資產階級在議會中取得強大的影響。隨後，廢除穀物法律，又永久保證了資產階級特別是資產階級中最活動的部分即工廠製造者，對於貴族的優先勢。這是資產階級最大的勝利；但這次勝利又是專爲資產階級本身利益的最後一次的勝利。以後，其他各次的勝利，資產階級都必須分若干利益給另一新的社會權力——最初是牠的同盟者，不久即成爲他的敵人。

產業革命產生了強大的資本家工廠主階級，同時也產生了人數更多的工廠工人階級。產業革命從這一手工業工場部門蔓延至別的部門，工人階級也跟着一天天長大起來，其力量也按此比例而增加。這一新的力量從一八二四年強迫囑強的議會廢除禁止工人結會自由的法律起，就已表現出來。在要求『修正選舉法』的鼓動中，工人就在改革黨中佔激進的一翼；當一八三二年的『修正選舉法』仍不許工人有選舉權時，工人就提出他們要求於『人民憲章』之中，并自己組織起來，成爲獨立的政黨——憲章黨（Chartist）

Chariste)，近代第一個工人政黨——以對抗那要求取消穀物法律的大資產階級。

那時，一八四八年二月和三月的大陸革命爆發了，在革命中，工人有很重要的作用，並至少在巴黎提出他們的要求，這些要求，就資本主義社會觀點看來，是決不能允許的。隨後就來了普遍的反動。最初是一八四八年四月十日憲章黨的失敗；其次是同年六月巴黎工人暴動的失敗；又其次是一八四九年意大利匈牙利和德國南部的失敗，最後是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路易邦拿巴特（Louis Bonaparte）（註一）在巴黎的勝利。至多在某一個時候，工人的要求之可怕的聲勢的確被壓抑下去了，但代價是很大的。以前，英國資產階級以爲必須發展宗教精神於工人階級之中，經過這些經驗以後，更加感覺這種必要了。英國資產階級，不管其大陸同僚之譏笑，仍然繼續年復一年的花費幾百萬金錢，在下降階級中宣傳福音；約翰布爾（John Bull）嫌自己的宗教機器不夠用，還請求宗教企業的最靈巧的組織者喬那當（Frère Jonathan）來幫助他，還從美洲輸入「復興派」（Revivalisme）摩提（Mody）和桑開（Sankey）及其他的神的商品，最後並接受救世軍的危險的幫助——救世軍是要復興原始基督教的宣傳，宣言窮人是神選的，攻讐資

（註一）即拿破崙第三。（譯者註）

本主義於宗教範圍內，並保存原始基督教階級對抗論的原素；這些大富翁現在供給金錢來發展救世軍，救世軍將有一天對他們發生危險。

資產階級在歐洲任何一個國家，不能像中古時代封建貴族那樣獨佔政權，至少也不能佔得長久的時間——這似乎是歷史進化的一種規律。即便在封建制度完全掃蕩了的法國，資產階級以其整個階級執掌政權，至多也只能維持很短的時期。在路易非立統治底下即當一八三〇年至一八四八年時，祇有一小部分的資產階級統治法國，大部分的資產階級，則受很高的選舉標準的限制，沒有選舉權。在第二共和國底下，即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一年時，資產階級固然整個的統治着，但不過三年；因為資產階級政治上的無能，所以產生出第二帝國，僅僅是現在，在第三共和國底下，資產階級才整個的保持政權至二十餘年；但資產階級現在已經表現出一些迅速崩潰的徵兆了。資產階級長久的統治，直至現在祇有在像美國那樣國家，本沒有貴族制度存在而社會開始就建築在資產階級基礎之上，才是可能的。然而在美國，像在法國一樣，資產階級的繼承者——工人——已經走來敲門了。

資產階級從來未曾在英國獨佔政權。一八三二年勝利之後，仍舊讓地主貴族專有差

不多一切的高級政府機關。富裕的中等階級情願自處於恭順的地位，這件事在我未聽見自由派的工廠製造家浮斯德(Mr. W. A. Forster)的一次公開演說以前，是不能夠瞭解的。浮斯德在他的演說中，勸伯拉福(Bradford)的青年人學習法文，說這是進入上等社會的一種方法；他舉自己做例并敘說自己的困難，因為他以大臣的資格必須在一種社會中往來，而那裏法文至少是與英文有同等需要的。事實上，當時英國的資產者普通都是一些未受教育的暴發戶，他們無可奈何祇好將國家機關的一切高等地位讓給貴族，因為在國家機關裏除了商業的詭詐所造成的島國的褊狹和島國的自足之外，是還需要其他技能的。即使現在，報紙上關於資產階級中等教育的滔滔不絕的辯論，也足夠證明英國資產階級不敢自信可以受高等教育并可以貪圖本分以上的東西。這樣，廢除穀物法律以後，人們也仍舊一致認為取得勝利的人哥卜丁(Cobden)伯來特(Bright)浮斯德等當然不能夠參加國家政府機關；必須再等二十年再有一個新的『修正選舉法』時候，他們才有門路到內閣去。英國資產階級現在還保持着牠的社會地位卑下的感情，牠以牠自己的經費和國家的經費豢養一個寄生階級，使之在一切國家機關裏頭光榮的代表民族，當牠的中間有一個人能夠加入這個天選的和特權的階級時候，牠并引以為無上的光榮——

其實這個階級還是牠自己製造成的。

工業和商業資產階級尚未達到驅逐地主貴族滾出政權時候，另一個敵手——工人階級——已經出現了。跟着憲章運動和大陸革命以後來的反動，以及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六六年英國商業的空前發展（平常祇說是由於自由貿易，其實也是由於鐵路航海以及一般交通機關的巨大發展），又加一次屈服工人階級在自由黨影響之下——工人階級在憲章運動以前是自由黨中的激進翼。但不久，工人的選舉權的要求，逐漸成爲不可屈抑的力量；正當自由黨的灰格派（Whigs）首領猶豫動搖時候，狄斯拉耶里（Disraeli）就顯示他的深算，替多利派（Less Tories），利用良好的時機，在城市中擴大選舉權并修正選舉區制。隨後又有無記名投票和一八八四年在鄉村中擴大選舉權以及重新修正選舉區制，使各區選舉權差不多相等。所有這些設施，大大的增加了工人階級的選舉力量，在一百五十至二百選舉區中，工人佔選舉人的多數。但議會制度是很好的學校，來訓練對於傳統的尊敬；如果資產階級是以崇拜態度和宗教誠敬對待曼涅（Manner）爵士所戲稱爲『我們的老貴族』，那麼工人羣衆也是以尊敬和謙遜態度對待資產者，因爲他們習慣上已經將資產者看作是『他們的上司』了。大約十五年前，英國工人是模範的工人，他

們對待主人的敬意的謙遜以及他們怯懦而不敢要求自己權利，這件事可以安慰我們的講壇社會主義派的經濟學家，他們是痛恨本國工人不可救藥的共產主義和革命傾向的。

但英國的資產者究竟是生意上的人，他們比德國教授看得更遠。他們祇是勉強分若干政權給工人階級。他們在憲章運動幾個年頭中知道了平民，這個『強壯的但是兇惡的小孩』，能夠做出甚麼；他們被迫得在英國憲法中加入『人民憲章』中最好的部分。現在比以前更應該用精神的方法將平民維持在秩序安寧中，而第一個最好的實行方法是，而且仍舊是，宗教。所以大多數的牧師坐在學校的講臺上，所以資產階級拿出一天多一天的經費鼓勵各種宗教的教派，從崇禮派（Ritualism）直至救世軍。

現在，英國的『會嚴』對於大陸資產階級的自由思想和待慢宗教，已經宣告勝利了。法國和德國工人已經變成了暴徒。他們完全的沾染了社會主義；因為許多原因，他們對於奪取社會優先權，並沒有合法的成見。『強壯的小孩』一天比一天的更『兇惡』了。法國和德國資產者祇剩下最後的一種辦法，就是慢慢的拋開他們的自由思想，譬如青年人在海中暈船時候將他上船時含着的雪茄煙拋在水中去一樣。玩世不恭的服爾德主義者（Voltaireans），一個個的埋頭於慈悲憐憫的心情中，含敬意的談論教會以及信條

和儀式，并且同化於宗教——如果他們覺得這對於他們是有若干利益時。法國資產者星期五日吃素，德國資產者星期日誠敬的聽新教教士的虔誠的說教。他們都與唯物論絕交了。‘Die Religion muss dem Volk erhalten werden’——『應該爲平民保存宗教』；唯有宗教能救社會於最後的崩潰。可惜他們是先儘力破壞宗教使之永不能存在以後，才發現出這個真理。現在，輪到英國資產者出來報復了，他們高喊說：蠢才，我們兩世紀前後就已經警告過你們呵！

然而，我恐怕無論英國資產階級的宗教迷信，無論大陸資產階級臨時抱佛腳的皈依宗教，都不能築成長堤以抵禦日漸高漲的無產階級巨潮。傳統是一種巨大的持久的力量，是歷史的『惰性』，但因這種力量單純是被動的，所以必定要被打破，因此宗教將不能夠是資本主義社會永久的保障。如果我們的法律哲學和宗教觀念都是某種社會支配的經濟關係之直接的或間接的產物，那麼這些觀念，在時間的進程中，不能夠不受這些關係之完全改變的影響。祇要不相信有超自然的啓示，我們就應該肯定說：任何宗教信仰都不足夠維持一個趨於崩潰的社會。

事實上英國工人已經重新發起運動了。他們無疑還受種種傳統的束縛。這些傳統之

中，有資產階級的傳統：譬如有一種普遍的信心以爲英國祇能夠有二個政黨——保守黨和自由黨，以爲工人階級要得解放，必須靠大自由黨幫助；也有工人階級由獨立行動的最初嘗試所遺留下來的傳統：譬如舊工會中永久開除出那些沒有經過規定的學徒時期的工人，以致每個工會之外，都造成一羣特殊的工人。但無論如何，工人階級已經起了運動；柏棧丹諾教授（Professor Bentano）也不得不報告這個事實給他的『講壇社會主義』的朋友。工人階級已經動起來了，像英國一切事情一樣，是遲緩而又有節制的動的：這裏表現遲疑，那裏却得着多少良好的效果。工人階級這裏或那裏對於社會主義字面上表示過分的不信任，但却採取了社會主義的內容，而運動也擴大蔓延開去，并一層層的影響廣大的工人羣衆。社會主義已經喚醒了倫敦東區的苦力，我們大家都知道這種新勢力表現出有何種強大的推動力。運動的進行固然沒有我們當中一部分沒有耐力的人所希望的那樣迅速，但我們不要忘記：英國工人階級是保存着良好的英國民族性的，在英國如果奪取了一個領地，普通是永遠不會失掉的。如果因爲上述諸原因，憲章運動派的兒子不能很好的利用環境，那麼他們的孫子是一定不會辜負其祖先的志願的。

但歐洲工人階級的勝利不是專依賴英國的，至少必須英法德三國工人階級合作。在

法德二國中工人運動的確比較英國工人運動進步。德國工人階級到政權去中間的距離，是能夠計算的。二十五年來所得的成績是空前的。工人運動以一天快似一天的速度向前進。如果德國資產階級悲慘的表示牠已經喪失了政治技能，紀律，勇氣，毅力和堅忍心：那麼德國工人階級就有無數證據，證明牠都具有這些優點。四個世紀以前，德國曾經是歐洲資產階級第一次暴動的出發點；在目前形勢之下，德國更成為歐洲無產階級第一次勝利的舞台，難道是超出可能範圍之外的嗎？

恩格斯於倫敦 一八九二年四月二十日

正文

近代社會主義所代表的思想之總和，不過是一種理智的反映，一方面反映那支配社會的有產者和無產者，資產者和雇用人中間的階級鬥爭，他方面反映那支配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但其理論形式，則首先表現出來的，乃是更展開的和更澈底的繼承十八世紀法國大哲學家所提出的原理。與一切新理論同樣，社會主義理論必然連繫於其切近的前輩之觀念統系，縱然事實上這個理論是從經濟事實的地基上發根的。

在法國，革命將要到來前，啓導革命精神的偉人自己就是偉大的革命家。他們不承認任何外來的權威。宗教，自然科學，社會，政府，都受最嚴酷的批評，都要到『理性』的法庭面前受裁判，判定其生存或宣布其死刑。『理性』變成一切事物的最高尺度。這個時代，用黑格兒(Hegel)的話來說，是『頭腦支配世界』的時代，這句話最初的意思是指唯有頭腦及思想所發現的原理才有資格可以做人類一切行動和結合的基礎，隨後更廣泛的意思是指一切與這些原理相衝突的物質的真實，都要從頭到底的被摧毀。

以前成立的一切社會和政府形式，一切傳統觀念，都要被看做非理性的而被拋棄於九霄雲外。以前的世界是讓可憐的成見所領導的；一切過去的，都祇值得憐憫和鄙視。現在，第一次，白日出現了；人們第一次進入理性的王國，從今以後一切迷信，偏私，特權和壓迫都要被掃盪無餘，而代之以永久的真理，永久的正義，自然的平等和不可侵犯的人權。

現在我們知道：這個理性的統治不是別的，究竟祇是理想化的資產階級的統治；所謂永久的正義祇成了資產階級的正義；所謂平等祇達到資產階級的在法律前的平等；人們宣布資產階級的私產權爲人權的第一條；所謂理性的國家，盧騷(Jean-Jacques Rousseau)的『社會契約』，已經出現了，——這個國家不是別的，祇是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十八世紀的大思想家，像他們的前輩一樣，也是不能跨過他們的時代所限定的界線之外的。

但在封建貴族和資產階級的對抗之外，還有剝削者和被剝削者懶惰的富人和勤苦的窮人的總的對抗。就因爲有後一種對抗，所以資產階級的代表得以自命爲不是代表一個特殊的階級，而是代表全體受痛苦的人類。還有，資產階級自從發生以來，自己就立足

在矛盾上面：沒有雇用勞動者，資本家就不能存在；中古時代行會資產者逐漸變成了近代的資產者，學徒和未加入行會的苦工也跟着逐漸變成無產者。如果，一般的說，當與貴族鬥爭時，資產階級能夠自命爲當時各種勞動階級的代表，可是，在每一次資產階級大運動之中，也發生那爲近代無產階級前輩之另一階級的運動。這樣，我們看見：當德國宗教改革時，有曼撒爾(Thomas Munzer)的運動；當英國大革命時，有『水平者』(Les Niveleurs)的運動；當法國大革命時，有巴堡夫(Bobbey)的運動。跟着這一尙未完全形成的階級的這些暴動而來，還發生一些理論：在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更有毫不掩飾的共產主義理論(莫勒里——Morely, 馬卜里——Mably)。平等的要求從此不應該祇限於政治權利上，而要擴大個人的社會地位；不僅要消滅階級特權，而且還要消滅階級差異。這種新學說的最初形式乃是禁慾主義的斯巴達式的共產主義。隨後就出現三大空想家：聖西門——他在無產階級思想之外，還保存有相當程度的資產階級傾向——傅立葉和歐文。歐文生長在資本主義生產最發展的國家，他在此生產所引起的階級鬥爭的印象之下，有系統的發揮他的消滅這個階級對抗的計劃，並將此計劃與法國唯物論連繫起來。

這三個人有一共同之點，即他們都不以代表當時歷史發展的無產階級自居，他們，與十八世紀法國哲學家一樣，自命爲不僅要解放某一階級，並要解放全人類；他們，又與這些哲學家一樣，也是要建立『理性』和『永久正義』之統治的；但他們所要的理性和永久正義，與這些哲學家所要的理性和永久正義，兩者之間，有天淵之別。依照這些哲學家的理性所造成的資產階級世界，在他們看來，是與封建制度及以前其他的社會形式同樣非理性的和非正義的，是與這些社會形式同樣要埋葬在歷史的大墳墓中去的。如果純粹理性和真正正義到現在還未統治世界，那是因爲這些東西還未被人發現出來。以前沒有發現這個真理的天才，現在已經有了。這位天才的出現及其發現真理的宣告，并非歷史發展上一種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事變，而祇是純粹的偶然。這位天才若能早出世五百年，就可以替人類減少這五百年來的錯誤，鬥爭和痛苦。

……十八世紀法國的哲學家，大革命的先驅者，曾經將理性當做一切事物的至高尺度。國家和社會必須建立在理性上面，一切違反永久理性的應該不顧惜的被摧毀；但這個永久理性不是別的，祇是理想化的資產階級的見解。法國大革命實現了這個理性社會和理性國家；但如果新制度對於過去制度是比較理性的，可是這些新制度距離絕對理性

的制度還很遠。理性國家已經完全破產了。盧騷的『社會契約』實現爲『恐怖』的統治；爲要逃避恐怖統治，不信任自己政治能力的資產階級，最初就隱匿在『督政局』(La Directoire)¹¹的腐敗之下，隨後又隱匿在拿破侖專制的指揮刀之下。預諾的永久和平變成了不斷的侵略的戰爭。建立在理性上的社會並不見得更好。富人和窮人的對抗，不僅未曾解決變成一般人的幸福，並且因爲連繫貧富間感情的行會和其他特權被廢止及緩貧富間衝突的教會慈善事業被取消之後，這種對抗反更形尖銳化了。建立在資本主義基礎上的工業發展，使工人羣衆的貧窮和困苦成爲社會生存的必需條件。犯罪的數量一年比一年增加。封建制度的罪惡，從前是公然表現的，現在則暗中進行了；資產階級的罪惡，從前祇敢祕密進行的，現在則到處披猖了。商業逐漸變成了合法的騙術。革命標語中的『博愛』，成了跟隨競爭而來的衝突和敵對。普遍的腐敗代替了暴力的壓迫；金錢代替了指揮刀，成爲社會的第一發動力。『初夜權』從封建諸侯手裏轉移到製造家手裏。賣淫事業發展至空前未有的程度。婚姻仍舊像從前是賣淫的合法形式和正式遮飾物，而且又加上了更多的姦淫事件。總而言之，拿來與十八世紀哲學家好聽的預諾的話比較來看，理性勝利以後的政治和社會制度，祇是一些使人愁苦失望的欺人之談。祇差

沒有揭破這種欺騙的人，而這種人到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交替的時候就出現了。一八〇二年，聖西門發表他的日內瓦書信 (*Lettres de Genève*)；一八〇八年，傅立葉發表他的第一部著作——可是他的理論基礎成立於一七九七年；一八〇〇年一月一日，歐文做新拉那克 (New-Lanark) 工廠的總經理。

在這時候，資本主義生產及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對抗，都還在幼稚時期。大工業才開始在英國發展，法國還不知道有這回事。唯有大工業，才可以發生那必然要引起生產方式革命之衝突——不僅是大生產所造成的階級中間的衝突，並且是生產力和交換形式中間的衝突。還有一層，大生產在其所造成巨大生產力中間，而且可以發展那能夠解決這些衝突的方法。如果在一八〇〇年前後，新的社會條件所產生的衝突，是剛剛發生的，那麼解決這些衝突的方法更加是剛剛發生的。巴黎的貧窮羣衆在恐怖時代中曾經有個短時期奪取了政權，他們這一回事祇是表示：在當時的條件中，這種政權是不可能。無產階級剛剛從貧窮羣衆中分化出來，形成新階級的核心；無產階級當時仍舊祇是受苦痛的和被壓迫的羣衆，沒有一切創意力，不能獨立的政治行動，並需要外來的和上級的幫助。

這種歷史狀況也支配了社會主義的創立者。不大發展的生產和不大發展的階級鬥爭，產生了不完全的理論。社會問題的解決法，當時尚隱藏在未成熟的經濟條件中，祇好靠腦筋製造出來。社會祇是一件紛亂的事物；建立和諧成爲理性的任務。因此必須計劃一新的完全的社會制度；必須以宣傳方法，如有可能并以模範的新村榜樣，來強迫社會接受這一制度。因此，這些新的社會制度必然註定祇是一些烏託邦（空想）；這些制度計劃得更周備，則更加表現其幻想性。

以上的話說過以後，我們就不再說到這完全屬於過去的方面來。讓一些文學上的雜貨舖老闆像煞有介事的去玩弄這些幻想把戲罷，這些現在祇能使我們發笑。讓他們拿這些空想的幻夢去抬高他們的冷靜的理性罷；至於我們，我們則喜歡尋求在這個幻想外套掩覆之下而爲這些僥倖父眼睛所看不見的天才思想之萌芽。

在其日內瓦書信中，聖西蒙已經就說：人人都要勞動，恐怖時代的統治就是貧窮羣衆的統治。在一八〇二年，將法國革命，看做是貴族，資產階級和貧窮階級中間的階級鬥爭，這已經是天才的發現。在一八一六年，聖西蒙肯定說，政治學不過是關於生產的科學，他并預言政治學將要包括在經濟學裏面。以爲經濟條件是政治制度的基礎，這種

認識，在聖西蒙學說中還祇是一種萌芽；然而這種見解明顯的包含有轉變人的政治上的政府爲物的管理和生產過程的指導的一種理論，卽最近甚囂塵上的消滅國家論。他又比他同時人更高超的見解，在一八一四年當聯盟軍攻入巴黎以後不久，更在一八一五年正當「百日戰爭」時候，宣言說：歐洲和平和繁榮發展的唯一保證，就是法國和英國同盟及此二國和德國同盟。必須有非常勇氣，才敢向一八一五年法國人宣傳與滑鐵盧的戰勝者同盟。

如果由聖西蒙，我們可以找到一種真正天才的遠大觀點，除開嚴格的經濟觀念以外，以後的社會主義者的差不多一切觀念之萌芽，都可以在這個觀點中看得出來；那末由傅立葉，我們就可以找到一種對於現存的社會條件之批評，這種批評，雖然帶有十足的高盧人的的興致，但是同樣深刻的。傅立葉先承認資產階級，承認其革命前受聖靈啓示的預言家，承認其革命後有利害關係的讚美者。隨後，他就不客氣的暴露資產階級世界物質的和精神的貧困；他拿這種貧困來比較哲學家預諾的好聽的話；受理性統治的社會，給一般人幸福的文明，人類的盡美盡善；并拿來比較當代思想家染上玫瑰顏色的空話；他說明爲甚麼實際上愈加貧困，說出的話就愈加好聽；他并放胆嘲笑空話的不可救

藥的失敗。傅立葉不僅是一個批評家，由其活潑的性質看來，他并且是一個諷刺家，無疑的是自古以來最大的諷刺家之一。他強有力的同時又很巧妙的描寫革命消沉後盛極一時的投機的欺騙行爲以及當時法國商業中人貪得無厭的市僧惡習。更挖苦人的，就是他對於資產階級的兩性的關係和婦女的社會地位之批評。他是第一個宣言說：在任何社會中，婦女的解放可以作爲一般的解放之尺度。但傅立葉最偉大的地方，乃在他的社會歷史觀。他分社會發展爲四個時期：野蠻，半開化，宗法制度和文明，——他所謂文明就是資產階級的文明社會；接着，他就證明文明社會怎樣將半開化人所實行的一切罪惡，從簡單的方式提高至複雜的二重意義的語帶雙關的虛僞的形式。他指出文明社會是在一個『循環圈』內，在其所不斷產生的矛盾中流轉不息的，絕不能夠解決這些矛盾，而要時常達到與原來所期望的相反方面去；譬如說，在『文明社會中，貧困是從富裕本身產生出來的』。我們看見，傅立葉運用辯證法，與他的同時人黑格兒同樣的靈巧。正當他的同時人不斷的說人類可以達到盡美盡善等的空話時，他就證明說：一切歷史階段各有其上升的和下降的時期，他并應用這種觀點來說明人類的將來。如果，自從康德以來，自然科學承認天體未來的死滅；那麼，自從傅立葉以來，歷史科學就不能夠不知道人類

未來的死滅了。

正當革命的巨風暴震盪法國時候，在英國也經過一次較不光耀的然而一樣有力的革命。蒸汽和機器，轉變工場手工業成爲大工業，并以此使資產階級的社會的整個基礎都發生革命。工場手業的慢性發展時期，變成爲高壓生產的狂飈突起時期。社會一天快似一天的分化爲大資本家和破產的無產者；小資產階級本來是社會中最固定的階級，自此以後也變成爲手工業者和小店主的漂流的羣衆，過着困苦的生活并形成全人口中最波動的部分。然而，新的生產方式當時祇在其上昇時期的發端，還是唯一常態的生產方式，還是當時唯一可能的生產方式；可是，這種生產方式已經產生出一些最明顯的社會病象：大城市的可恐怖的四郊聚集了許多流浪的人民；宗法和家庭下級服從上級的傳統完全解體；過度勞動，尤其婦女和兒童的過度勞動，推行至極端的限度；突然陷入於新條件生活的工人階級完全的徬徨失錯。於是發現出一個改革家——一個二十九歲的實業家。這是一個具有難得的指揮羣衆能力而又有極高天真性質的人。歐文接受了十八世紀唯物論者的學說，以爲人的性質一方面是自然組織的產物，他方面是其生存環境尤其發展時代環境的產物。在產業革命中，大多數實業家，歐文的同時人，祇看見混沌和紛

亂，可以利用來渾水摸魚的迅速增加自己的財富。他則以爲這是在混沌中實行他的得意理論以建立秩序的機會。他已經在曼徹斯特，在他當經理的一個五百工人的工廠中，做過一次美滿試驗。從一八〇〇年至一八二九年，他以股東兼經理的資格，應用同樣原理於蘇格蘭的新拉那克大紗廠，這一次他有更大的行動自由，得着更大的功效，使他的名譽傳遍全歐洲。他將包含複雜分子而大部分是徬徨歧路的二千五百工人羣衆，做成模範的新村，其中沒有酗酒，警察，監獄，詞訟，公家救濟事業和私人慈善事業。

這些是毫不足爲奇的。因爲工人被位置於人類中最高尙的條件，因爲逐漸長大的一輩工人的教育受了小心謹慎的監督。歐文是幼稚園的第一個創立者，他創立幼稚園於新拉那克。小孩養至兩歲以後，就送到學校去，他們在學校遊戲十分快樂，甚至要領他們回家去，他們還不願意。正當他的競爭者強迫工人每天勞動十三至十四小時時候，歐文却在他的工廠減少勞動時間至十小時半。某次因棉花恐慌，停止工作至四個月，工人還能繼續支領完全工資。然而，工廠增加原來資本至二倍以上，直至最後還給各股東以優厚利潤。

但這些都不能使歐文滿意。他給他的工人的生活，在他眼中看來，還不是人所應享

的生活。『這些人是我的奴隸』。他給他們的比較良好的環境，還遠不能使人的性質和聰明爲完全的和合理的發展，更加不能使人自由舒展其能力——『二千五百人替社會生產的真實財富，多過於半世紀前六十萬人的生產。我自問：這二千五百人所消費的財富和六十萬人所消費的財產之差數，究竟往那裏去了呢？』答覆是簡單的。這個差數，是除了付給股東以原來資本之百分之五以外，還有三十萬磅利潤。新拉那克已經是這樣，英國一切其他工廠更加是這樣。『沒有這種靠機器造成的新財富，就不能夠供給反對拿破命的戰爭，就不能維持貴族的社會制度。然而這個新的力量，乃是工人階級所創造的啊』——（註一）這個力量因此應該屬於工人階級所有。新的生產力，以前祇使少數人發財而羣衆反要當奴隸牛馬，照歐文意見，以後應該變成改造社會的基礎；這些生產力應該屬於社會公有，并祇能用於公衆的幸福。

從這種實際的觀點，可以說亦就是商業的計算的結果，就產生歐文的共產主義。這種共產主義始終保存着這種實際性質。這樣，在一八二三年，歐文提議以共產主義新村辦法，來救濟愛爾蘭的貧困。他擬好了一個詳細計劃，包含建設的經費，常年的用費和

（註一）摘錄歐文寄給一八四八年法國臨時政府和紅色共和黨的意見書。（恩格斯註）

大約的收入。他的確定的改革計畫，是很細心的研究并含有很實際的知識；如果人們實行他的改革計畫，那就即使在專門的技術上也沒有可以修改的地方。

信從共產主義，這在歐文生活上是一個危險時期。當他安心當慈善家時候，他獲得財富聲望名譽和讚頌。他是歐洲最得人心的人。不僅資產者，連達官侯王都聽他，都讚頌他。但當他變成共產主義的信徒以後——一切都改變了，照他的意見，有三個大障礙阻止社會改革：私有財產，宗教和現存的結婚形式。他知道，如果他攻擊這三件事，他將滾出上流社會並失去社會地位。但這絕不能阻止他去攻擊這三件事，結果他所預料的果真都發現了。他被驅逐出上流社會，輿論界對他一致封鎖，尤其不幸的，即他在美溯共產主義試驗失敗，犧牲了他的一切財產，使他破產。他直接求助於工人，至於三十年間永遠積極的在工人中間活動。英國所有真實的進步，所有為工人利益的社會運動，都與歐文名字有關。在一八一九年經過五年努力之後，他使議會通過第一次限制工廠中女工和童工勞動的法律。各工會聯合成爲一大職工會之第一次大會，是他當主席。他又爲共產主義社會組織未實現以前採取一種過渡的辦法：一方面是生產和消費合作社，這至少有一種作用，可以證明社會可以無需要商人和製造家；他方面是『勞動市場』，靠一

種以勞動時間爲價值單位的紙幣，來交換勞動的生產品。這種交換市場必然要失敗的，但却爲在一八四八年設立的蒲魯東的『交易銀行』之先導。不過所不同的，即歐文的紙幣並非醫治社會病的萬應良藥，而單是向着更澈底的全社會革命走去的第一步。

當這時候，接着十八世紀哲學之後，近代的德國哲學也生長起來。黑格兒集德國哲學之大成。黑格兒最大的功績，就在提出辯證法爲思想的最高形式。古代的希臘哲學家都是天然的辯證法學者，其中頭腦最淵博的亞里士多德已經分析過辯證法思想之主要形式。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的哲學，其中雖然可以找到光耀的辯證法的代表（笛卡兒，斯賓諾莎等），但特別因爲受英國影響，逐漸傾向於所謂玄學的方法；玄學方法差不多完全支配了十八世紀的法國人，至少也支配了他們的專門關於哲學的著作。然而在純粹的哲學以外，他們也能夠產生一些辯證法的名著；我們祇舉出狄德祿（Diderot）的拉謨之姪（Nevu de Rameau）和盧騷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Discours sur l'origine et les fondements de l'inégalité parmi les hommes）做例，就可以知道。我們要簡單的說明這二種方法的主要性質。

當我們沉默的觀察自然界，人類歷史和我們自己的精神活動時，最初呈獻給我們的

印象，是許多事實互相貫串着交動着的一條無窮無盡的鎖練，在這鎖練中，沒有一件事實停留在原來的空間，保持原來的性質，存在原來的狀況，一切都流動，轉變，來去，形成，消滅。這一種原始的樸實的但根本正確的世界觀，就是古代希臘哲學的世界觀。黑拉克里特（Heraclitus）第一個明白的說出：一切存在，一切又不存在，因為一切流動，一切在永久的轉變中，在永久的形成和消滅中。但這種觀點，雖然很正確的反映我們觀察真實世界現象總體時所得印象的一般性質，可是拿來解釋構成這個總體之個別的现象，之詳細的情節，還不夠用。然而我們若不知道這些詳細情節，則對於我們目前的现象總體，也不能有個明確的觀念。要知道這些詳細情節，我們必須將這些詳細情節，從其自然界的和歷史的鎖練中，分開出來，必須一個一個的分析其特殊的性質和因果。這就是自然科學和歷史科學的任務。這些專門科學，由於許多原因，不能在古典時代的希臘人中佔第一等位置，因為他們必須先搜集關於這些科學的材料。

正確的自然科學之研究，僅僅是亞歷山德里時代的希臘人以及後來中古時代的阿拉伯人才萌芽的。真正的自然科學，直到十五世紀下半期才有，以後就一天快似一天的進展了。分解自然界為若干組成的部分，分別各種自然界過程和自然界物體為一定的範

噫，於有機體的複雜的解剖形式中細密研究有機體——這些就是最近四個世紀以來使我們的自然界知識長足進步之主要條件。但這種工作方法，養成我們一種習慣：即研究自然界物體和過程是在這些物體和過程各個隔離的狀態中去研究的，是撇開這些物體和過程互相關連聚成爲一大整體的情況而去研究的；觀察物體不是在其運動的狀態，而是在其靜止的狀態，不是將其看做主要是可變的，而是將其看做主要是不變的，不是在其生的狀態，而是在其死的狀態。隨後，受培根和洛克的影響，這種工作習慣就從自然科學方面流傳到哲學方面去。於是造成了最近幾個世紀的特殊狹隘性——玄學的方法。

照玄學家看來，事物及其在精神上的反映，即觀念，是一些隔別分析的對象，應該一個一個的分別來看，是一些不變的固定的不動的和一次造成就永久一樣的東西。玄學家的思想是沒有中間性的兩極端，是直接相反的思想；他們的說話是：是——是或非——非，除此以外一切都沒有價值。照他們意見，一件事物或是存在，或是不存在；一件事物不能夠是自己同時又是另一件事物。否定和肯定是絕對不能相容的。因和果是永遠互相對立的。

這種觀點，驟見似乎是非常正確的；因爲這是所謂『常識的』觀點。這位『常識朋

友』，安分處在他的作用所及的範圍內，是很可尊敬的，但若冒險走到科學的廣闊世界去，則他要鬧出許多笑話。玄學方法在許多方面——其範圍各隨研究對象不同而有廣狹的差異——應用起來是正確的和必需的，但遲早總要到一定的界限，過此界限則就成爲片面的狹隘的抽象的并混雜在不可解決之矛盾的中間了。觀察個別的事物而忘記其相互關係；觀察事物的存在，忘記其形成和消滅；觀察事物的靜止，忘記其運動。樹株阻止他們看見森林。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很確定的說：某種運動存在或不存在。但我們更深刻的去研究，就可以發現這個問題時常是最複雜困難問題中的一個；審判官是很知道這種複雜困難問題的，他們用盡力量要找出一條合理的界限，超過這個界限之外的打胎才能成爲謀殺的罪名。同樣，死亡的時刻也是不能夠確定的。生理學的研究，已經證明死亡不是一種頃刻間的現象，而是一個很長時間的過程。同樣，一切有機體在同一頃刻是自己，又是別物；在同一頃刻，有機體吸取外來的物質并排出自己的物質；在同一頃刻，有機體的一些細胞死了，而別的細胞造成起來。在久或暫的時期中，有機體的物質完全換新的并代以別的物质質的原子，因此整個有機體永久是自己同時又不是自己。我們更進一步觀

察事物，我們就看見一種相反現象的兩極，積極和消極（或肯定和否定），是互相不可分開的又是互相敵對的，是無論怎樣敵對都要互相銜接起來的。同樣，因和果的觀念，也是祇在個別情形之下應用，才有價值；祇要將這個個別情形混和在宇宙的總體中來看，因和果即刻就含混起來并消失在總的相互關係的大鎖鍊中，在這鎖鍊中，因和果是常常互換地位的；在這鎖鍊中，在這一處所和這一時期的因，變成了另一處所和另一時期的果。反之亦然。

所有上述這些自然界的過程和思想的方法，在玄學的思想框內，是找不到的。恰好相反，辯證法則觀察事物及其在精神上的反映，即觀念，乃在其運動中，在其形成和消滅中；上述的這些過程恰好證明辯證法之正確。自然界就是辯證法的試金石；我們應該感謝自然科學，牠搜集日多一日的豐富材料，并以此材料證明最終的裁判判定支配自然界的是辯證法而不是玄學。但依照辯證法而思想的自然科學家既然是罕有的，於是科學的新發現和現存的思想方法中間之衝突就引起了自然科學理論上無法整頓的混亂；這種衝突使先生和學生著作家和讀者一樣的為難。

要正確的顯示宇宙，顯示宇宙和人類的發展，以及顯示這種發展在人類頭腦中的反

映，祇有靠辯證法，靠不斷的觀察無限的原動和反動，形成和死滅，進步和退化，——才能做到。近代德國哲學一開始就勇敢的走上這條道路。康德（Kant）開始他的事業，就在將牛頓的不動的太陽系及其最初一次碰衝而後永久存在這個理論，改變成爲歷史過程的理論，即認爲太陽和行星是從旋轉的星雲中形成的。同時，他又做出結論說，形成太陽系這一事實就含有其未來死滅的必然性。這種見解，過了半世紀以後，就給勞伯宿由數學上證明了；再過半世紀以後，分光學的分析又證明了空間中確有這一類凝結程度不同的自然的氣體的星雲存在。

德國新哲學，由黑格兒的體系集其大成；在此體系中，第一次——這也是黑格兒的最大功績——將整個自然界的歷史的和精神的世界，看做一種過程，即是說看做是在不斷的運動，變化，轉換和發展中的；而且人們企圖尋找出：能使這種運動和發展結合爲一的內心連絡線索。由此觀點看來，人類過去歷史從此就不被看做是無意義暴力之下混沌的紛亂，都要到哲學家的理性法庭面前受刑罰；不是的，人類歷史應該看做是人類發展的過程；思想家的任務現在就在研究這種過程經過其一切的旁叉錯路而終於遲緩的然而進步的進行步驟，并從這些表面上似乎偶然發生的現象中間尋求出其內心的規律。

黑格兒沒有完成這個任務，這對於我們是沒有多大關係的。他的開啓一個新時代的功績，就在提出這個任務。這一類任務絕不是個人獨力所能夠完成的。黑格兒雖然像聖西蒙一樣，是當時最淵博的頭腦，但首先他必然爲他自己知識的範圍所限制，其次他也被當時的知識和觀點同樣狹隘的範圍所限制。還有一層，黑格兒是唯心論者；這就是說他不僅不把他的觀念看做是真實世界的事物和運動之理智上的反映，而且偏要把真實世界的事物及其變化祇看做是他的觀念的反映。據他的意見，一件事物的觀念是先此事物而存在的，這個觀念誰也不知道存在在甚麼地方并怎樣存在；歸根結蒂說，世界是照一種永久觀念的模型造成的。世界祇是這個絕對觀念之實現，而這個觀念因此是在世界以外離開世界而獨立存在的。這種觀點從頭到底的顛倒了真實世界和人類腦中所產生的觀念中間之真正的關係——人類頭腦根本也就祇是這個真實世界的一種產物。如果黑格兒的天才到處表現在他的哲學體系裏頭，如果我們在黑格兒著作的每一頁中都可發現一些偉大而正確的觀念，關於自然科學和人類歷史所提出的問題；但這個體系整個的祇能夠反映爲這個體系基礎的根本錯誤。這個體系是巨大的流產，但這是這一類體系中最後的一個。還有一層，這個體系內部包含有一種無法解決的矛盾：一方面，黑格兒很合理的

以爲人類歷史在其本身性質上就是一種無限的發展，因此這種發展不能以發明一種自命爲絕對的真理爲最終的界限；他方面，他又以爲他的哲學體系就是這一絕對真理之總結。包括一切的和一次造成永久可用的一種關於自然界和歷史知識的體系，是與辯證法思想的根本規律相矛盾的，辯證法思想不僅不否認而且肯定說，關於宇宙的系統知識從這一輩人到那一輩人都有長足的進展。

這一德國唯心論的根本錯誤既經徹底的發現，就應該堅強的回轉到唯物論去；但自然，這并不是說簡單的回轉到十八世紀玄學的和專屬機械的唯物論。這種唯物論，在其興奮的革命感情之中，曾經簡單的將整個的過去歷史看做是一種罪惡，愚蠢和瘋狂的積聚。恰好相反，近代的唯物論則從歷史中看出人類漸進的并時常間斷的發展，而其任務就在從這種發展中尋求出運動的規律。十八世紀的法國人甚至黑格兒，都把自然界看做一個整個不變的東西，運行於狹隘的旋轉圈內，其中有牛頓所說的永久的天體，又有林納(Tinne)所說的有機物的不變的物種。恰好相反，近代的唯物論，則將自然科學新近的進步的知識綜合起來；根據這些知識，自然界也有其時間上的歷史。星球以及其中在良好條件之下能夠生存的有機物物種，都是一樣的生長和消滅的；而宇宙的範圍也比較

大得多。無論在那種情形之下，近代的唯物論根本是辯證法的，并再不需要那自命爲超出其他一切科學之上的哲學了。祇要每個個別的科學恰切認識其在自然界和歷史事實以及我們對此事實的知識之總和中佔據何種位置，則就無需要專門研究這種總和的特別科學。以前包括一切科學的哲學，以後可以用一種科學來代替，即關於思想及其規律的科學：形式邏輯和辯證法。此外，一切科學都是關於自然界的和歷史的實證科學（Science positive）。

正當自然界觀的革命按照科學供給的實證材料數量爲比例而完成時候，一些歷史的事實也發生出來，需要歷史觀也經過一次確定的改變。在一八三一年，第一次工人暴動發生於里昂；從一八三八年至一八四二年，第一次全國性的工人運動（英國的憲章運動）達到其最高點。無產者和資產者中間的階級戰爭爆發於那決定人類運命的幾個民族之歷史舞台上。這種戰爭，依照大工業發展和資產階級新近獲得的政治勝利鞏固爲比例，而劇烈起來。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說：勞資利益一致論，普遍和諧論，自由競爭能造成大衆繁榮論——都經事實不留情的證明是騙人的了。人們不能夠漠視這些事實，也不能夠漠視法國和英國社會主義——這種社會主義就是這些事實之理論的——雖然是不完

全的——反映。但仍保持存在的舊的唯心史觀，是不認識建立在物質利益上的任何階級戰爭，也不認識任何物質利益的；牠藐視和輕鄙生產及一切經濟關係，認為祇是文化史上次要的原素。新的事實發生，使人們拿新的眼光去觀察整個過去歷史，於是人們看見：整個歷史祇是階級鬥爭史而已，這些互鬥的階級無論何時何處都是某種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即那時代經濟關係之產物，因此，某一社會的經濟結構就永遠成爲這一社會的真實基礎，我們要了解政治法律制度以及宗教哲學及此社會其他思想之一切上層建築物，必須研究這個真實基礎。這樣，唯心論就被驅逐出最後的藏身地——歷史科學；唯物論的歷史科學之基礎就建立定了。道路已經開闢了，將領導我們以某一時代人的生活方式去解釋同一時代人的思想方式，而非像前人那樣，以思想方式去解釋生活方式。

但如果十八世紀的唯物論，與近代自然辯證法的科學不能兼容，那麼以前發展下來的社會主義也是與新的唯物論的歷史科學不能兼容了。不錯，社會主義也批評資本主義生產及其效果，但并未曾解釋這種生產，更不能從理論上推翻這種生產，祇認這種生產是不好的，必須廢除的罷了。

但問題首先是在確定資本主義生產在人類發展中的歷史位置，是在證明在某一歷史

時期這種生產是必要的，因此其未來的崩潰也是必然的；其次是在揭露那還在隱藏中的資本主義生產之內心性質，以前的批評是偏於描寫這種生產所發生的弊病，而少注意研究造成這些弊病的原因。『剩餘價值』之發現才完成了這個任務。剩餘價值發現出來，就可說明無給值的勞動之篡取，乃是資本主義生產及連帶而來的對於工人的剝削之根本形式；說明資本家縱然將工人的勞動力看做市場中的商品，而以完全價值購買所雇工人的勞動力，他們仍舊可以從勞動力中榨取出比他們所給工資更多的價值；并證明這種剩餘價值最終形成了有產階級手裏所積累起來而又不斷增加的資本之價值的總和。資本主義生產以及資本生產的過程，於是乎解釋明白了。

這二種大發現：唯物史觀和以剩餘價值揭露資本主義生產秘密，都是馬克思的功績。這二種發現使社會主義成爲一種科學，現在祇要研究這個科學的一切細節和關係。……首先是生產其次是生產品的交換，構成一切社會制度的基礎。這二種元素決定當時社會中財富的分配，因此更決定構成此社會之階級及其中各層的形成。所以，如果我們要尋求那決定某種社會變化或某種社會革命之原因時，則不應到人的頭腦中到人對於永久真理和永久正義的最高知識中去尋求，而應到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化中去尋

求；總而言之，即不應到所研究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求，而應到這個時代的經濟中去尋求。我們在歷史上時常看見，有一種不可抵禦的確信，認為現存的社會制度是非理性的和不公平的；以前是理性的產物現在變成無意義的東西；以前是一種恩惠現在變成一種鞭撻。這些現象表示甚麼意義呢？表示生產方法和交換形式，緩慢的和潛默的經過幾次變化，已經非那適應於陳舊的經濟條件之社會制度所能容納的了。如果這種觀點是正確的，怎麼新的經濟條件本身一定包藏有救治那已經發現的弊病之方法，不過這些方法發展程度不同罷了。因此我們的頭腦應該用來從某種生產的物質事實中尋求這些方法，而不應該憑空去發明這些方法。

近代社會主義對於現存的社會制度之態度究竟是怎樣？

現存的社會制度是現存的統治階級即資產階級之創造物。資產階級特有的生產方式，即自從馬克思以來所稱為資本主義生產的，是與封建制度，與地方和等級特權，與行會和農奴制度，不能兼容。資產階級破壞了封建制度，在其廢址上建立起資產階級制度，建立起競爭自由居住自由契約自由法律前平等及其他資產階級欺人制度的統治。自此以後，資本主義生產就可以自由發展了。當法國大革命時，這種資本主義生產的主要

形式，至少在歐洲大陸，乃是建立在分工上的工場手工業。但自從蒸汽和機器改變這種工場手工業爲大工業以來，在資產階級指揮之下造成的生產力，就以空前的速度發展并擴大至空前的規模。工場手工業發展到某種程度，必然要與行會的封建制度障礙物發生衝突；同樣，大工業完全發展以後，也要與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發生衝突。新的生產力已經超出了那權取這些生產力的資產階級形式。生產力和生產形式中間的這種衝突，并不是人類頭腦裏面所生出的衝突，如像人的宿罪和神的正義之間的衝突一樣；這乃是客觀的事實的衝突，這個衝突并不是造成此衝突的人的意志和行爲所能左右的。社會主義不過是這種事實上的衝突之思想上的反映。我們不難明瞭，這種思想上的反映首先是發生在直接感受這種衝突痛苦的階級即工人階級之頭腦中。

這種衝突究竟是怎樣？

資本主義生產未發生以前，祇有小生產存在：小農的——自由的和農奴的——農業，城市的手工業。小生產的第一個條件，就是生產者本身即是所使用的生產機關之所有主。勞動機關——土地和農具，作坊和工具——都屬於個人所有并祇適宜於個人的使用；可見這些勞動機關是細小的零星的有限的，正爲如此，所以普通是屬於生產者自己

所有。集中并擴大這些散碎的和細小的生產機關，使之成爲近代生產強有力的骨幹——這恰好就是資本主義生產及其執行人（資產階級）之歷史使命。從十五世紀以來，資產階級怎樣完成這個歷史使命，生產怎樣經過三個發展階段——單純合作制，工場手工業和大工業——這些已由馬克思在資本論第四篇詳細敘述過了。從資本論第四篇中，我們又可看出：資產階級怎樣將這些細碎的生產機關集合起來，集中起來，將無數的個人生產力，工人和工具，放在一個共同的指導之下，并以此就改變了生產機關的性質：生產機關從個人的變爲社會的。如果以前個人或至多一家的勞力就可以使用舊的細碎的生產機關而工作，那麼現在就需要一大隊的工人才能使動這些集中起來的生產機關。蒸汽和機器完成了這種變化。紡紗機器，織布機器，蒸汽鐵錘，代替了舊式紡紗機織布機鐵錘的位置；需要幾百幾千工人共同勞動的工廠，代替了個人作坊的位置。生產就從許多個人的勞動行爲轉變成爲許多社會的勞動行爲；個人的生產品轉變成爲社會的生產品。在生產中，集體代替了個人的位置。

但這個革命祇發生於生產上，而未波及到舊的交換形式。這個革命是完成於那建立在社會分工上面的一種社會環境之中。社會分工允許生產者有對於自己生產品的所有

權，因此使這些生產品成爲商品形式，商品的交換（買賣）就構成生產者中間的社會連繫。這對於祇有獨立的個人生產者時期，是好的；交換形式正適合生產方式。新的生產形式就是在這種個人的商品生產者社會中潛滋暗長起來。新的生產形式的革命性是很少人知道的，以致人們反運用這種生產形式去增加並發展商品的生產。一開始，這種生產形式就連結於現存的商品生產機關和交換機關：商業資本，中古的手工業和雇用勞動。這種生產形式表現爲商品生產的新形式，而屈服於商品生產的佔有形式。生產機關和生產品，從個人的變成社會的以後，仍舊被人看待做個人的生產機關和個人的生產品。這些事物——生產機關和生產品——是被入佔有的，但不是被使用生產機關和製造生產品的人所佔有，而是被資本家所佔有。生產機關和生產，根本上已經變成社會的了；但人們仍舊強之屈服於那導源自個人私家生產的一種佔有方式，——在個人生產中，各人佔有自己的生產機關，因此各人也佔有自己的生產品并拿到市場出賣。生產方式雖然破壞了這種佔有方式所導源的個人私家生產，但仍舊要屈服於這種佔有方式。正因爲這個矛盾，所以新的生產方式帶上資本主義的性質，以後近代社會一切矛盾之萌芽也都包含在這個矛盾裏面。新的生產方式愈加侵入於一切工業和一切在經濟上佔重要地位的國家，

愈加排斥個人生產直至使之祇成爲無關緊要的作用，同時就愈加增加社會生產和資本主義佔有中間的不能兩立性。

我們已經看見，最初的資本家出現時，僱用勞動的形式早已存在了。但這種僱用勞動，不過是勞動者例外的補助的附帶的過渡的職業。農業勞動者或作或輟的被雇作日工，但他們各自有一小塊土地，至少可以夠自己的需用。行會組織起來，爲的使現時的夥計可以變成將來的師傅。但自從生產機關變成社會的并集中在資本家手裏以來，所有這些都改變了。雇用勞動從前是例外的和補助的職業，現在却成爲整個生產的尺度和基礎了；從前是附帶的職業，現在却佔據生產者的整個勞動時間了。一天的雇用勞動者變成終身的雇用勞動者。生產機關和生產者已經分離了，前者集中於資本家手裏，後者祇有自己的勞動力，此外一無所有。社會生產和資本主義佔有中間的矛盾就表現成爲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中間的矛盾形式。

我們已經看見，資本主義的生產潛滋暗長於商品生產者個人勞動者的社會中，這種社會的唯一的社會連繫就是生產者的生產品之互相交換。但凡建立在商品生產上的社會，都有一特性，卽生產者不能支配其相互的社會關係，而反爲這些社會關係所支配。

每個人依靠其手裏所能取得的偶然的生產機關，爲個人的交換需要而生產，可見，在社會生產中有無政府狀態存在。但商品生產，與其他一切生產形式一樣，都有其固有的規律，而這些規律是不願無政府狀態，并在無政府狀態中，而且依靠無政府狀態而進行的。這些規律支配那唯一遺留下來的社會連繫形式即交換，并像競爭的必然規律一樣，支配生產者。起初，生產者並不認識這些規律，祇有逐漸的經過長期經驗，才能發現這些規律。這些規律是不靠生產者幫助甚至違反生產者意志而進行的；像自然界的規律一樣，這些規律的進行是盲目的和無情的。生產品支配生產者。我們試變換一個方式來解釋這一點，或者更容易瞭解些。

在中古時代社會中，生產主要是爲滿足生產者個人及其家庭的需要；有主奴關係的地方，譬如在鄉村，生產兼爲滿足地主諸侯的需要。但這裏是沒有交換的；因此生產品不帶有商品的形式。農民的家庭差不多生產一家所需要的東西；衣服以及食物。農民家庭生產品，祇在滿足自己消費之後還有餘力的時候。這個剩餘生產品拿去交換，就成爲商品。不錯，手工業者在自己的行爲中，一開始就要爲交換而生產，但他們的日用必需品大部分也是自己生產出來的；他們都各有一小塊土地（田地或菜園），他們豢養牲畜

在公有的森林中，他們燃燒和建築的木材都從公有森林中樵採出來，婦女還可紡紗織布……可見爲交換而生產即商品生產，那時尚在幼稚時代。所以，交換是有限制的，市場是狹小的，生產方式是停滯不變的；每一個集團，在其內部組織起來而生產，以排斥其他集團的生產品；鄉村中有『馬克』(Mark)(註一)，城市中有行會。

生產逐漸發展。生產者及其家庭或封建諸侯所直接消費以外的剩餘生產品，更加增多起來；城市工業生產得更好，更多，因此就有了做商品的材料；這些剩餘生產品拿去交換，於是就變成商品。商業發展了並開始將許多國家一個個連結起來。商業的進步反影響到工業來，並加速工業的發展；舊時的停滯狀態，確定的被打破了。分工的進步破壞了舊的組織，在這種組織中每個家庭是直接爲自己消費而生產的。鄉村也與城市一樣，農業也與工業一樣，都逐漸要爲交換而生產；以自然物交納的租稅（徭役，麥穀，牲畜）變成以錢幣交納的賦稅或地稅。差不多一切生產品都帶上商品的形式，『馬克』和行會的舊組織一經破壞之後，生產者就逐漸變成隔離的和獨立的生產者。於是社會生

(註一)『馬克』是古代日耳曼民族建立在土地公有的公社之名稱；這種公地制度的痕跡現在還保存着，不僅日耳曼國家有，即在日耳曼人佔據過的西方國家也有。(恩格斯註)

產的無政府狀態就顯露出來並加強起來。

但資本主義生產用以加強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所用的主要工具，恰好是無政府狀態的反面：仍爲個人私產的作坊，其中的生產已經變爲社會的，而且一天比一天的組織起來。這種組織就結束了舊時的和平的停滯的狀態。某種工業一經採取這種組織，則這種工業就不允許任何舊的剝削形式與新組織同時存在；這種組織侵入中古的某一種手工業，就將這種手工業破壞并加以改造。勞動場變成戰場。地理上的大發現及因此而來的殖民地，更擴展了商品銷路并改變封建的手工業爲資本主義的工場手工業。不僅同地方個別的生產者中間發生鬥爭，而且由地方間的鬥爭擴大成爲民族間的鬥爭：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的商業戰爭。最後，大工業和國際或世界市場的建立，更使這些鬥爭成爲全世界的鬥爭，其劇烈程度竟是空前所沒有的。具有自然的和人爲的優良生產條件，就可決定個別資本家以及整個工業部門或整個民族的生存。失敗者只好被人不留情的踐踏於足底下。這是達爾文主義的生存競爭，以更加劇烈的程度從自然界應用到社會來。動物的野蠻性成爲人類發展的最後階段，社會生產和資本主義佔有中間的矛盾，就表現成爲個別工廠的生產組織性和整個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中間的矛盾形式。

資本主義生產一開始就具備這二種矛盾形式，始終在這二種形式之內旋轉成爲傅立葉發現的『循環圈』而沒有出路。但傅立葉當時自然也還見不到這個『循環圈』無形之中會縮小起來：資本主義生產所旋轉的是螺旋圈而非正圓圈，結果將像行星的運行一樣，要與其旋轉的中心發生衝突。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造成一種動力使大多數人變成無產者；隨後正是這些無產者羣衆反轉過來結束了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他方面，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所造成的動力又將機器的無限能力造成一種爲所有工業資本家必須遵守的規律，按照這個規律，資本家必須不斷的改良其機器，不然就要破產。但改良機器同時就是廢止一部分人的勞動。如果採用並增加機器，可以使幾千個管理機器的工人代替幾百萬手工工人的工作；那麼改良機器就是一天多一天的驅逐機器工人出工廠去，最後就造成一羣失業者——他們是超出資本需要以外的剩餘勞動力——造成工業後備軍，準備到工業興盛時期可以投身工作，到必然的危機到來時，則被丟棄於馬路的水門汀上。無論何時，工業後備軍總是工人階級爲自己生存而反對資本鬥爭之一塊絆腳石，總是壓低工資在資本家所能滿意的低下水平線的標準器。結果，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就是機器成爲資本反對工人階級鬥爭之最強有力的武器；就是勞動機關奪去工人的生存工

具；就是勞動者自己製造的生產品變成壓迫自己的工具。結果，『生產費用的節省，同時就是不顧惜的浪費勞動力並無廉恥的消滅改善勞動所必需的條件。』結果，機器本是最強有力的節省勞動的方法，反變成了最可靠的方法，使勞動者及其家庭的整個生命完全成爲替資本增加價值的勞動時間。結果，這一部分人的過分勞動却造成別一部分人的失業，而走遍全世界去尋求新的消費者之大工業却限制自己國內羣衆的需要使之挨飢忍餓並自己毀壞了國內市場。『能使資本之進步和積累永遠與相對人口過剩之進步和積累同處在平衡狀態——這種規律使勞動附着於資本，比較武爾剛神（Vulcan）用他的尖斧將卜羅麥修（Prometheus）釘在他的巖石上面，更加結實。這種規律使貧困的積累與資本的積累成正比例；在這一極端，積累財富，同時在另一極端，即在以資本形式生產自己的生產品之階級方面，就積累貧窮，痛苦，無知，粗暴，墮落和奴性』（見馬克思資本論，二八五頁）。要求資本主義生產以另一種方式來分配生產品，這無異於要求電池的傳電器分析水的成分時，不要送養氣到陽極去送輕氣到陰極去一樣。

我們已經看見，因爲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關係，增進近代機器能力至最高程度，就要造成一種必然的規律，迫得工業資本家非時時改良其機器時時提高其生產力不可。

擴大生產規模的簡單可能性，現在對於工業資本家也變成另一種的必然的規律。大工業強大擴展力，拿來與氣體擴展力比較，只有過之而無不及；這種擴展現在正不顧任何阻礙，而要求質量和數量上的擴展。現在能夠爲這種擴展的阻礙的，只有大工業生產所需要的消費，銷路和市場。但市場的擴展能力，無論向外擴大和向內充實，却受另外一種比較不猛烈的規律所支配。市場的擴展不能與生產的擴展平行並進。衝突是不能避免的；這種衝突既然在未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破壞以前，是不能得到解決的，那麼在這個時候自然要變成週期性的衝突。於是資本主義生產又造成一個新的『循環圈』。自從一八二五年爆發第一次大危機以來，整個工商業世界，一切文明民族以及在其統轄下文化程度不同的屬國之生產和交換，差不多每相隔十年，都要紛亂一次。商業停止了，市場充滿了，生產品滿滿的堆積起來賣不出去，貨幣藏匿起來，信託事業失掉信用，工廠關閉，工人羣衆缺乏生活必需品，企業倒閉不斷的發生，拍賣存貨一刻也不停。好幾年中，生產停頓，生產品浪費並大批的毀壞；這種情形一直繼續到堆積如山的商品減價出賣逐漸流通出去，到生產和交換逐漸的恢復經常狀態。從此生產的步驟又逐漸加速了，開快步了，由快步變爲跑步了，直到工業商業信託和投機事業大賽馬的飛步經過了一些

最危險的障礙競賽之後，復又重墜落到危機的深坑裏去。這樣的週而復始。自從一八二五年以來，我們已經經過六次危機，現在正發生的是第七次危機。這些危機的性質是很明顯表露出來的，甚至傅立葉當時也能將這些危機完全描寫出來并稱第一次危機爲『多血質的危機』，意思是說這種危機是由豐裕造成的。在危機中，社會生產和資本主義佔有中間的矛盾，明顯的表露出來。商品流通停止了；流通的工具——貨幣，成爲流通的障礙物。生產和流通的一切規律，都被破壞不起作用。經濟的衝突達到其最高點。生產方式暴動起來反對交換方式；生產力暴動起來反對自己所造成的生產方式。

工廠內部生產的社會組織發展至相當程度，遂與那在工廠外并支配工廠的社會生產無政府狀態，不能並容——這件事實連資本家自己也能夠明瞭的，因爲在每次危機中，他們看見許多大資本家和更多小資本家破產，由此破產造成暴力的資本集中。資本主義生產的整個機械屈服於其自己造成的生產力壓迫之下。這個機械造成了廣大生產力，却再沒有方法將這些生產力改變爲資本，即改變爲剝削工人階級勞動力的手段。

因爲這樣，生產力就『失業』了；因此工業後備軍也不得不『失業』了。駭人的狀況！生產機關，生活要品，失業的勞動者，一切生產和財富原素，都過剩了；但傅立葉

說過：過剩成了窮乏和貧困的源泉，因為過剩阻止了生產機關和生活要品變成資本。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機關要起作用，首先應該變成資本，變成剝削勞動力的手段。這種情形彷彿就像一個鬼怪出現於工人和生產機關及生活要品中間。唯一的就是這個鬼怪阻止了生產中人的動力和物的動力二者互相接觸，因此更阻止了二者中間的合作；唯一的也是這個鬼怪禁止生產機關起作用，禁止工人去勞動並生活。打破資本主義的生產形式，允許生產機關不帶資本形式就能起作用，那時，事實中的不合理制度就歸於消滅，危機就沒有了，社會就有生活的可能了。

因此我們看出：一方面，資本主義生產已經不能左右如意的指揮其所造成的生產力；他方面，這些生產力本身也日緊一日要求解決矛盾，要求取消其成為資本的資格，要求實際承認其本來性質，即社會生產力的性質。這是不斷增長的生產力對其資本性質的反抗；這種非承認其社會性質不可的要求，也逐漸逼迫資產階級，在資本性質所能允許的限度內，將這些生產力也看成是社會的。在緊張生產時期由於極高的信用，在危機時期由於資本主義大企業的倒閉——遂發生多數生產機關屬於社會所有的形式，這個形式就是各種股份公司。這些生產機關和交通機關裏頭有許多本來就是非常偉大的，譬如

鐵路本來除了股份公司以外就沒有別種資本主義剝削形式所能夠經營。但往後發展到了相當階級，股份公司形式也變成不夠用的。於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官家代表——國家，就不得不負起指揮這些生產力的責任。國有產業的必要，最初在偉大的交通機關感覺到：郵政，電報，鐵路等。

如果危機證明出資產階級從此以後不能夠左右如意的指揮現代生產力，那麼大生產企業和交通機關改由股份公司經營和收歸國有，就證明出資產階級已經變成贅瘤了。資本公司的一切社會作用，現在都可以拿支領工薪的雇員來代替。資本公司現在再沒有任何社會作用，除非是收受進款，簽發支票并在交易所中各自拿自己的資本出來賭博。資本主義生產開始是排斥工人使之失業，結果連資本公司自己也排斥出去，使之與工人同進於相對的人口過剩隊伍中去，不過目前資本公司尚未進入於工業後備軍罷了。

但無論改由股份公司經營或收歸國家所有，生產力仍舊保存其資本的性質。這就股份公司說，是明顯無疑的。至於近代的國家，那也不過是資產階級社會爲使資本主義生產的一切條件避免資本公司個人或工人的防害而造成的一種組織而已。近代國家無論其形式如何，根本是資本主義的機器，資本家的國家，可以說亦就是理想的集體的資本家。

國家佔有的生產力愈多，就愈加變成真實的集體的資本家，也就有愈多的國民受其剝削。工人仍舊永遠是雇用勞動者，無產者。雇用者和被雇用者中間的資本主義關係，並未毀滅，反走到極端了，而走到極端以後就要開始衰落了。生產力收歸國家所有並不是解決衝突，但已包含有解決衝突的原素。

這種解決不是別的，祇是實際承認近代生產力的社會性；這就是說使生產方式佔有方式和交換方式，與生產機關的社會性調和融合起來。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須到社會公開的自由佔有那已經增長至非別種力量所能管理的生產力時候，才能做到。

生產機關和生產品，現在倒轉過來危害生產者本身並定期的破壞生產和交換，將來到了那時其社會性就完全的公開的被承認了。社會力量亦如自然界力量一樣，當未曾被我們瞭解以前，當我們未與之相適應以前，是盲目的強暴的和有破壞性的。一經瞭解了，一經我們認識其行動，方向和效果了，我們就可以逐漸使社會力量服從我們的意志，利用社會力量以達到我們的目的。近代生產力的社會性也是如此。

當我們固執不承認近代生產力的社會性之時——譬如在資本主義生產的情形中——這個生產力就違反我們，反對我們，支配我們，如像上面所說的。一經瞭解並承認以

後，這個有破壞性的生產力，在聯合起來的生產者手裏完全自覺的使用之下，就將變成強有力的生產動力之一。這一種情形之差別，彷彿就像有破壞性的雷電和被人使用的電報之差別一樣；也就像火災和被人使用的火之差別一樣。實際承認近代生產力的社會性，這就等於說：拿以社會及其各分子所需要為標準的經濟組織去代替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這也等於說，拿建立在近代生產力本性上的佔有形式去代替資本主義的佔有形式；前者，生產品一方面直接為社會所佔有以爲維持並發展生產之用，他方面直接為個人所佔有以爲生活并享樂之用；後者則造成一種制度，使生產品起初束縛生產者，隨後又束縛佔有者。

資本主義生產逐漸使廣大羣衆變成無產者，同時就造成一種軍隊，這種軍隊或者自己已在貧困中絕滅了，或者完成這個革命。資本主義生產逐漸將社會化的巨大的生產機關收歸國家所有，同時就指示出完成這個革命的道路。無產階級奪取政權，首先就將生產機關收歸國家所有，但因此無產階級也就取消了其爲無產階級的資格，取消了一切階級間的差異和階級間的矛盾，同時也就取消了國家之爲國家的資格。以前建立在階級矛盾上的社會需要國家，將國家看做是每個時代剝削階級所造成的一種組織以保障其剝削條

件，尤其以暴力鎮壓被剝削階級使之屈服於當時生產所需要的條件之下（奴隸制度，農奴制度，雇用勞動制度）。國家是全社會的官家代表人，是全社會的具體形象；但國家必須是當時代表整個社會的階級之國家，才有這種作用，一經真正變成整個社會的代表人以後，國家就成爲贅瘤了，既然社會沒有被壓迫階級，既然階級統治和建立在生產無政府狀態上面的生存鬥爭以及隨着鬥爭而來的衝突和專肆，都完全被掃蕩了，那時既然無所用其壓迫，國家自然也就歸於無用。國家真正成爲整個社會代表人之第一件行爲，即以社會名義佔有生產機關的行爲，同時就是國家之所以成爲國家之末一件行爲。物的管理和生產過程的指導代替了人的政府。自由的社會不能容許國家存在於自己及其分子的中間。

社會佔有一切生產機關——這個理想，自從資本主義生產在歷史上出現以來，就成爲盪漾於個人及整個宗派眼前的一種多少模糊的理想。但必須到實現這個理想的物質條件已經具備時候，這個理想才成爲可能，才表現爲歷史的必要。階級的消滅，與其他社會進步一樣，要能實現，必須有某種新的經濟條件存在，而非由於羣衆中間簡單的確信，認爲這些階級存在是違反平等正義或博愛的，也非由於要消滅這些階級的簡單的意

志，社會之分化爲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階級，乃是以前社會生產薄弱發展之必然結果。在社會勞動生產品用來維持社會全體最低限度生活以外所剩餘無多的時候，在社會內大多數人的時間完全或差不多完全要從事勞動的時候，這個社會必然要分成階級。在這些專致力於勞動的大多數人以外，形成了離開直接生產勞動的少數人，他們擔任社會公共事業；勞動管理，政府，司法，科舉，藝術等。可見，分工規律是社會階級分化的基礎；但這決不是說社會階級分化非由暴力，搶掠，狡詐和欺騙所促成的，也不是說統治階級一經成立之後絕不損害勞動階級利益以鞏固自己權力并絕不改變社會的指導爲羣衆的剝削。

階級分化雖然有某種歷史的理由，但祇限於某一定的時代，在某種社會條件之下。階級分化是建立在生產的不足上面；生產完全發展，階級就失其根據。事實上，我們要想最後的消滅階級，必須等待我們達到一種社會水平線，那時不僅某一統治階級成爲贅瘤，而且一切統治階級以至於社會階級分化都成爲贅瘤了。這就是說，必須等待生產發展到某種程度，使一階級佔有生產機關和生產品，亦即一階級的政治統治教育壟斷和文化指導——不僅是不必要的，而且成爲經濟政治和文化發展上的障礙物。這種發展程

度，現在已經達到了。資產階級已經差不多不將自己的政治破產和文化破產當作一件秘密的事；資產階級的經濟破產更是有規則的每隔十年發生一次。在每十年一次的危機中，社會，在其自己所造成的并再不能由自己支配的巨大生產力和生產品壓迫之下，窒息着轉不過氣來；疲弱無力的社會面前呈現這種不合理的事：即生產者沒有可消費的，因為缺乏消費者。

生產機關的擴展力，將資本主義生產所束縛生產機關的鎖練，炸破了。生產機關從資本主義生產的束縛底下解放出來，乃是保證生產力不斷加速發展即生產本身無限增長之唯一的先決條件。但還不止此。生產機關為社會所佔有，不僅剷除了現在束縛生產的人為的障礙物，而且也消滅了浪費以及毀壞生產力和生產品的行為，——這種行為是現在的生產所不可避免的連帶而來的現象，這種現象在危機中達到最高的程度。還有一層，生產機關為社會所佔有，因此生產品歸社會所享用，使統治階級及其政治代表之荒唐奢侈成為不可能。以社會的生產，保證社會一切分子不僅能過完全足夠的逐漸優美的物質生活，而且同時可以自由發展並表現其體力的和精神的機能——這種可能性現在已經有了，雖然是破天荒第一次，但究竟有了。

社會佔有生產機關以後，就不再生產商品了；這就是說，上述的生產品支配生產者的一種生產品佔有形式再不存在了。自覺的和有系統的組織代替了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個人的生存鬥爭停止了。祇有到那時候才能夠說，在某種意義之下，人類才確定的脫離獸性的統治；祇有到那時候，真正人的生活才代替獸的生活。生活條件以前是支配人類的，那時就將受人類所支配。人類成爲支配自己社會組織的主人，同時也就第一次成爲支配自然界的真正的和自覺的主人。人類自己社會行爲的規律，以前像外來的無情的自然界規律一樣，支配人類；以後，人類將完全認識這些規律的因果而使用這些規律，因此就支配這些規律。人類組織成社會的形式，以前是受自然界和歷史所決定的，那時將是人類自由創意的行爲。以前支配歷史的客觀力量，那時就受人類所支配。祇有從那時起，人類才完全自覺的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而人類所種的社會因才能逐漸正確的產生人類所期望的社會果。人類終於脫離必然的世界而進入自由的世界。

我們試概括的總結人類發展的進程：

(一) 中世紀社會

細碎的小生產。生產機關適合於個人使用，因此是原始的，細小的，效能有限

的，但因此往往爲生產者自己所佔有。生產是爲供給生產者自己或其封建領主之直接消費。消費以外的剩餘生產品才拿去出賣，才拿去交換；商品生產尙在初生狀態，但內部已經包含有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之萌芽。

(二) 資本主義革命

工業的變化，最初經過單純合作制和工場手工業。以前散碎的生產機關集中到大作坊來，即生產機關由個人的變爲社會的——這種改變尙未侵入交換範圍，因此尙保存舊的佔有形式。資本家出現，成爲生產機關的主人，佔有生產品并使之成爲商品。生產已經成爲社會的行爲，交換和佔有仍舊是個人的行爲；社會生產品被個人資本家所佔有。這是根本的矛盾，亦即是我們的社會一切矛盾之源泉。

一·生產者和生產機關分離。勞動者被判定終身做雇用勞動。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中間的矛盾。

二·支配商品生產的規律，由於大工業發展（自從十八世紀末期以來）關係，特別活動。競爭中鬥爭異常劇烈。個別工廠生產的社會組織性和全體生產的社會無政府狀態中間的矛盾。

三·一方面，機器的改良成爲競爭中所有工業家必須遵守的規律，並日多一日的使許多工人失業——工業後備軍；他方面，生產的無限制擴張也成爲所有工業家必須遵守的規律；這二種規律造成生產力的空前發展，供給多過需要，生產過剩，市場擁擠，十年一次危機，『循環圈』。這裏生產機關和生產品過剩，那裏無工作不能生活的工人過剩。但爲生產和社會幸福的這二種動力不能連合起來，因爲資本主義的生產形式禁止生產力發生作用並禁止生產品流通，除非是生產力和生產品先變成資本；但這又受生產過剩所阻止。矛盾一直發展到沒有出路。生產方式暴動起來反對交換形式。資產階級表示從此不能左右如意的指揮社會生產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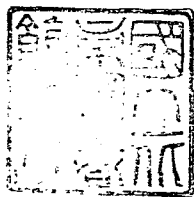
四·資產階級迫不得已部份的承認生產力的社會性；生產和交通的大機關先改由股份公司經營，隨後又收歸國家所有。資產階級成爲無作用的階級，其一切積極的作用都爲雇用勞動者所代替。

(三) 無產階級革命——矛盾的解決

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并利用政權將從資產階級手裏奪得的社會生產機關，沒收

爲公共產業。由這行爲，無產階級就取消了生產機關的資本性質，使其社會性質能完全自由表現出來，使依照預定計劃的社會組織成爲可能。生產的發展使社會階級的存在成爲贅瘤。國家的政治威權跟着社會的生產無政府狀態一同消滅。人類終於成爲自己的社會關係的主人，成爲自然界的主人，成爲自己的主人——自由了。

完成這一解放世界的功業，這就是近代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深刻研究這一解放功業的歷史條件，其特殊性質及其不可避免的效果，并使現在受壓迫但担負解放使命的階級完全認識其即將到來的行動之條件和性質——這就是科學社會主義，即無產階級運動的理論反映，所應負的使命。





2.2
12